

王世慶對《臺灣總督府檔案》的
介紹、管理與研究*

張家榮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纂

摘要

王世慶任職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30 餘年之久，並長期負責督導管理省文獻會典藏檔案，對《臺灣總督府檔案》之保存整理、推廣應用卓有貢獻，已為研究者所熟知。本文透過檔案內容與相關記載，除略敘省文獻會沿革與《臺灣總督府檔案》檔案接收過程外，主要以典藏管理及論著研究兩個面向，再深入細節，加以考察討論王世慶在省文獻會早期管理《臺灣總督府檔案》過程，來重新理解王世慶對《臺灣總督府檔案》整理推廣工作及相關貢獻。而由這些考察，發現王世慶不論在管理，或者推廣應用等面向，確實展現了與同儕不同做法，做出了有意義的貢獻。

關鍵字：王世慶、臺灣總督府檔案、文獻會、檔案管理、檔案應用

壹、前言

王世慶日治時期出生於板橋下溪州，於新竹州立桃園農業學校及府立臺北師範學校本科就學。後入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擔任採訪員，隨著臺灣省通志館與通志館顧問委員會改組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王世慶繼續於省文獻會擔任過組員、編纂、組長等職務；雖兩度辦理退休，但又因省文獻會修志工作與業務需要，皆重回省文獻會工作；直到1993年才因屆齡，以「委員」職務真正自省文獻會退休。其後進入中央研究院擔任兼任研究員並在多所大學兼任教職。¹

王世慶長期在省文獻會整理組工作，接觸《臺灣總督府檔案》²甚深，對《臺灣總督府檔案》之保存整理、推廣應用卓有貢獻。有關《臺灣總督府檔案》的相關介紹，過去已有諸多文章，³不再贅提。而王世慶對臺灣史研究貢獻卓越，也有諸多文章討論，在1980年代即有翁佳音撰寫〈功在臺灣文獻學術界的王世慶先生〉一文，並指出：「五、六〇年代以整理臺灣地名，

* 本文撰寫期間承王孟亮教授提供相關資料，並督促實地赴臺灣總督府檔案相關典藏場地勘查，並承洪健榮教授、林佩欣老師會議期間協助，及臺灣文獻館整理組協助卡片目錄之拍攝，三位審查人提供意見亦使本文得以改進，《臺灣文獻》蕭碧珍組長、李澍奕先生相關協助，另承楊絲羽小姐、李昭容老師意見提供，併予致謝。本文如有任何缺失，仍由筆者負責。

- 1 有關王世慶生平，可參見：王世慶口述，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訪問，《王世慶訪問紀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3年）、王世慶口述，周婉窈撰述，《臺灣史開拓者王世慶的人生之路》（板橋：新北市文化局，2011年）。
- 2 臺灣總督府檔案包括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舊縣公文類纂……等等，本文在行文上，除引用原文外，並不特別做區分。
- 3 有關總督府檔案討論可參考：王世慶，〈介紹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文獻》，第17卷第4期（1966年），頁157-192；陳文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收藏之日治時期檔案——兼述拓殖大學相關學校文書目錄——〉，《拓殖大學百年史》，3號（1999年），頁29-40、黃淑惠，〈臺灣總督府檔案編排與描述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圖檔所碩士論文，2007年）、陳文添，〈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收藏之檔案及提供利用概況〉，《臺灣學研究》，第4期（2007年），頁77-90、莊樹華，〈臺灣總督府檔案的編排與描述〉，《檔案季刊》，第7卷第3期（2008年），頁54-72、栗原純，〈臺灣總督府檔案與臺灣史研究〉，《成大歷史學報》，第37號（2009年），頁1-20、東山京子，〈門類別分類から見た臺灣總督府文書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第39卷第2期（2019年），頁1-73、徐國章，〈臺灣總督府檔案學習入門〉（南投：臺灣文獻館，2017年）、張家榮、劉仁翔，〈臺灣總督府檔案：從歷史文獻到數位人文脈動的軌跡〉，《第11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臺灣文獻館，2021年），頁65-103等。另鍾淑敏亦曾撰寫〈臺灣總督府相關檔案與日治時期臺灣史研究〉（未刊稿）一文，並曾以同題目於2017年11月15日在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作專題演講，見〈【臺史所專題演講】臺灣總督府相關檔案與日治時期臺灣史研究〉，收入「政治大學活動報名」網站：<https://moltke.nccu.edu.tw/Registration>（2023年2月15日點閱）。

七〇年代初期以撰寫地方文獻和整理運用及介紹總督府公文檔案，七〇年代中期以來則以蒐集族譜、民間古文書有功於學術界」。⁴此一分析，在時間上雖可在商榷，但可以說評價了 1980 年代以前，王世慶的學術轉折與貢獻。

因王世慶在臺灣史的特殊貢獻，2002 年有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與國立臺灣大學合辦「林本源中華文教基金會九十一年度年會暨王世慶與臺灣社會經濟史研討會」，⁵ 2003 年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自行辦理「臺灣社會經濟史國際研討會：慶祝王世慶先生七五華誕」，⁶ 2011 年則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與林本源基金會合辦「臺灣研究在德國、紀念王世慶先生研討會暨 2011 年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年會」，⁷ 與會學者提出不少對王世慶學術貢獻之論文宣讀。

然而，上述研討會內容，除少數如李季樺〈典型在夙昔：王世慶先生與古文書、族譜的蒐集與研究〉一文後來曾改寫並收錄於《臺灣風物》第 61 卷第 4 期，其餘多數並未正式出版。⁸ 李季樺一文主要係說明王世慶蒐集古文書與族譜歷程，並指出王世慶將族譜與古文書應用於農村金融、地方開發與番漢關係等面向。

而其他相關論文部分，包括褚填正〈王世慶與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研究

4 翁佳音，〈功在臺灣文獻學術界的王世慶先生〉，《史聯雜誌》，第 8 期（1986 年），頁 86-97。

5 其中包括：許雪姬，〈王世慶先生的口述歷史〉、溫振華，〈王世慶先生與臺灣北部區域史研究〉、高志彬，〈王世慶先生在方志撰修方面的業績〉、陳文達，〈王世慶先生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鍾淑敏，〈王世慶先生與日治時期臺灣史〉等篇主要皆探討王世慶學術貢獻。見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林本源中華文教基金會九十一年度年會暨王世慶與臺灣社會經濟史研討會》（臺北：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未出版）。

6 其中包括：森田明，〈台灣史研究との出会いと王世慶先生〉、溫振華，〈王世慶先生與清代臺灣社會經濟史研究〉兩篇主要探討王世慶學術貢獻，見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臺灣社會經濟史國際研討會：慶祝王世慶先生七五華誕》（臺北：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未出版）。

7 其中包括：陳鴻圖，〈終身的職志：王世慶先生的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何鳳嬌，〈王世慶先生與日治以後社會經濟史之研究〉、李季樺，〈典型在夙昔：王世慶先生與古文書、族譜的蒐集與研究〉、鍾淑敏，〈王世慶先生與總督府檔案的研究利用〉、許雪姬，〈王世慶先生與臺灣地方志的纂修〉。見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林本源基金會，《臺灣研究在德國、紀念王世慶先生研討會暨 2011 年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年會會議資料》（臺北：中研院臺史所，未出版）。

8 李季樺，〈典型在夙昔：王世慶先生與古文書、族譜的蒐集與研究〉，《臺灣風物》，第 61 卷第 4 期（2011 年），頁 151-168。

及發展》⁹一文說明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接收、整理過程，並勾勒出臺拓檔案在各研究領域的開展，並認為在這過程王世慶扮演了重要的關鍵，從整個臺拓檔案研究發展脈絡，皆展現了王世慶早年的研究視野。

劉育嘉〈王世慶在臺灣史研究上貢獻之析論〉一文，¹⁰ 主要係評析王世慶所撰論文，並認為王世慶因長期從事史料整理保存工作，論文貢獻在於發掘史料並開創研究新方向、考據詳實及啟發後輩研究者。

深入探討王世慶與《臺灣總督府檔案》，目前僅 2007 年王世慶受邀第 6 屆臺灣總督府文書學講習會特別演講，會後經施佩奴、金柏全記錄，由周婉窈與王世慶定稿，以王世慶名義，將紀錄發表於《臺灣文獻》季刊，對王世慶與《臺灣總督府檔案》接收管理歷程有詳細說明，但該文屬王世慶演講紀錄，雖記錄王世慶所親身經歷，但也因屬記錄稿，無法多加旁引其他相關文獻，且該文以第一人稱行筆，較少就講者本身多做評論，較為可惜。¹¹ 而前述 2011 年「臺灣研究在德國、紀念王世慶先生研討會暨 2011 年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年會」鍾淑敏曾發表〈王世慶與總督府檔案的研究利用〉，¹² 雖應已有所討論，但並無出版。

上述文章，從各學術脈絡梗概，皆給予王世慶貢獻高度評價。因此，本文僅就前述基礎，透過檔案內容與相關記載，除略敘省文獻會沿革與《臺灣總督府檔案》檔案接收過程外，主要以典藏管理及論著研究兩個面向，再深入細節，加以考察討論王世慶在省文獻會早期管理《臺灣總督府檔案》過程，冀重新理解王世慶對《臺灣總督府檔案》整理推廣工作及相關貢獻。

另外，本文認為王世慶對整理推廣《臺灣總督府檔案》的貢獻出現，應早翁佳音所述之 1970 年代前期，但王世慶自省文獻會第 1 次退休，確實在

9 褚填正，〈王世慶與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研究及發展〉，《臺灣文獻》，第 63 卷第 4 期（2012 年），頁 165-207。

10 劉育嘉，〈王世慶在臺灣史研究上貢獻之析論〉，《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 2014 年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論文集》（臺中：興大歷史，2014 年），頁 1-20。

11 王世慶，〈六十年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的保管、整理、編譯、運用和研究〉，《臺灣文獻》，第 60 卷第 1 期（1993 年），頁 537-552。

12 該次會議，筆者無緣與會，未知內容，且無論文集出版，無法進行引註，尚祈見諒。另本文撰寫期間亦蒙鍾淑敏老師提供〈臺灣總督府相關檔案與日治時期臺灣史研究〉一文供參，僅此致謝。

1970 年代前期，因此本文內容所敘大略自省文獻會接收檔案迄 1970 年代前期。

貳、省文獻會與總督府檔案接收

一、省文獻會的成立與王世慶

1948 年 4 月，省政府公布「臺灣省通志館組織規程」，其後依據該規程第 3 條規定，為「協助及計畫通志館」等事宜，復於 6 月，公布「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組織規程」。在顧問委員會規程第 4 條規定：「本會得置採訪員 7 人至 17 人」，¹³ 因此，顧問委員會成立後，陸續聘請採訪員。¹⁴

首批擬聘採訪員包括：林衡立、吳南生，謝汝銓、¹⁵ 劉金狗（兼聘）、¹⁶ 之後又陸續聘用王英石、郭海鳴、曹甲乙、陳萬增、李蒼降、賴翔雲、¹⁷ 王金連、¹⁸ 陳大欣（兼聘）¹⁹ 等人，並從通志館調來陳石，再聘賴子清、林川、陳世慶。²⁰ 1948 年 12 月 30 日李蒼降以「患肋膜炎」為理由，請辭採訪員，

13 制定「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組織規程」，《臺灣省政府公報》，夏字第 60 期（1948 年），頁 902。

14 採訪員之職務，依「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辦事細則」為：「承主任委員之命，辦理採訪通志各項資料事項」，見「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辦事細則修正及代訂議事規則抄發飭遵案」（1948 年 12 月 1 日），〈通志館組織規程附該館顧問委員會組織規程〉，《臺灣省級機關》，臺灣文獻館（原件：檔案管理局），典藏號：0040123001944006。另有關通志館與顧問委員會成立及相關人事，可參閱邱欣怡，〈臺灣省通志館之成立經過與組織編制初探〉，《臺灣文獻》，第 60 卷第 3 期（2009 年），頁 201-220。另省文獻會成立及初期相關人事亦可參見許雪姬，〈忘年之交 - 獻堂仙與雲萍師〉，《臺灣文獻》，第 57 卷第 1 期（2006 年），頁 126-131。

15 「林衡立等核薪通知書」（1948 年 08 月 25 日），〈臺灣省通志館任免〉，《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原件：檔案管理局），典藏號 0040323303013006。

16 「聘請林衡立等為本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採訪員」（1948 年 8 月 3 日），〈臺灣省通志館任免〉，《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 0040323303014009。

17 聘郭海鳴等為本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採訪員」（1948 年 9 月 13 日），〈臺灣省通志館任免〉，《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 0040323303013001。

18 「聘王金連為本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採訪員」（1948 年 9 月 02 日），〈臺灣省通志館任免〉，《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 0040323303013009。

19 「據報聘請陳大欣兼任該會採訪員准予備查」（1948 年 10 月 14 日），〈臺灣省通志館任免〉，《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 0040323303015001。

20 「聘賴子清等為本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採訪員」（1948 年 12 月 21 日），〈臺灣省通志館任免〉，《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 0040323303015011。

此一請辭，省府在 1949 年 1 月 17 日同意。²¹

王世慶在此之後，由同學賴翔雲介紹，再經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黃純青遴選，進入顧問委員會擔任採訪員。該委員會在 1949 年 2 月 10 日發給王世慶聘函，同日核定薪額 160 元，2 月 12 日到職。²² 當時，該委員會並無組室區分，故於王世慶履歷書中，所填擔任工作為「採訪資料」。²³

1949 年 5 月 13 日省政府公布「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組織規程」²⁴、並廢止「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組織規程」，²⁵ 6 月 28 日改聘通志館與顧問委員會人員為省文獻會職員。²⁶ 7 月 1 日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正式成立，由原本通志館館長林獻堂、通志館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黃純青分任省文獻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²⁷ 7 月 9 日啟用關防。²⁸ 王世慶也在此時，轉任省文獻會

21 「通志館顧問委員會李蒼降任免通知書」（1949 年 1 月 14 日），〈通志館人員任免〉，《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 0040323305807002。另李蒼降曾與陳炳基、李薰山、林如堉、李登輝等共組「新民主同志會」，1948 年 3 月該會改名為「臺灣人民解放同盟」。1948 年 10 月間林如堉、李薰山相繼被捕，12 月 31 日送高等法院審理，李蒼降在此事件中，並未受逮捕偵訊。其後，李蒼降後因涉基隆中學鍾浩東案，於 1950 年 1 月在南京東路住宅被捕，10 月 14 日槍決身亡。

筆者訪問李蒼降女兒李素慧時，李素慧相當肯定曾聽其母述及李蒼降約在當時曾「患肋膜炎」；但由藍博洲所著《幌馬車之歌續曲》來看，李蒼降於林如堉、李薰山被捕後，「將臺北一部分同黨分子移交『上級』李絮，轉往基隆工作」，則李蒼降自通志館顧問委員會辭職，似乎亦難說與林如堉、李薰山被捕完全無關。然而，1949 年 4 月李蒼降與曾碧麗結婚，《幌馬車之歌續曲》一書中曾碧麗說法：「婚後，他仍然在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擔任採訪員」，此一說法，則有待進一步釐清。參見：蔡榮根，《在監獄裡出生的名醫》（三重：財團法人李蒼降教育基金會，2023 年），頁 55-83 及藍博洲，《幌馬車之歌續曲》（中和：印刻文學出版社，2016 年），頁 47-67。

22 「據送通志館及顧問委員會改組移交清冊覆希知照由」（1949 年 09 月 27 日），〈臺灣通志館及顧問委員會改組移交案〉，《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 0042960007909001。

23 「王世慶公務人員履歷表」（1991 年），收於《王世慶人事資料》，南投：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辦事細則修正及代訂議事規則抄發飭遵案」（1948-12-01），〈通志館組織規程附該館顧問委員會組織規程〉，《臺灣省級機關》，典藏號：0040123001944006。

24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組織規程〉，《臺灣省政府公報》，夏第 36 期（1949 年），頁 459-460。

25 〈廢止「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組織規程」〉，《臺灣省政府公報》，夏第 36 期（1949 年），頁 461。

26 「通志館曾今可等任免通知書」（1949 年 06 月 27 日），〈文獻委員會委員任免〉，《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 0040323305848002。

27 「據送通志館及顧問委員會改組移交清冊覆希知照由」（1949 年 09 月 27 日），〈臺灣通志館及顧問委員會改組移交案〉，《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 0042960007909001。

28 「省文獻委員會啟用關防官章日期核備案」（1949 年 07 月 12 日），〈教育機關印章〉，《臺灣省級機關》，典藏號：0040141004780018。

整理組組員。²⁹

二、省文獻會檔案的接收

在王世慶尚未進入顧問委員會前，1948 年 7 月 28 日該顧問委員會召開第一次顧問委員會議，會議討論其中一項為：「請省府將原總督府檔案移館保存或借用」。³⁰ 後據王世慶所述，這次決議「並沒有馬上實現」³¹。

「並沒有馬上實現」的原因為何？目前尚未見完整敘述。但考察相關文獻，當時陸續面對空間不足、人事異動兩項因素，是延宕接收《臺灣總督府檔案》展開的關鍵。

在空間因素上，通志館與顧問委員會同地辦公，借用臺北市臺灣廣播電臺仁愛路 3 段 51 巷 1 號的倉庫使用，³² 除了沒辦法提供外地職員足夠宿舍，³³ 光辦公室已經電臺「屢來催索，似未便久占不還」，因此，1949 年 4 月 1 日即函請省政府另撥新房舍作為館址。³⁴ 之後省文獻會成立，仍陷於辦公空間不足、落腳何處等問題，直到後來向民間購置房舍，才算勉強解決通

29 王世慶轉任省文獻會，擔任組員時期，其履歷書於「擔任工作欄」皆寫為「整理文獻」，在 1951 年 05 月 12 日一份省級機關檔案中亦曾提及：「該（筆者按：整理）組原配組員李孝本、王世慶等二員」，又稱：「最近王組員又擬請調採集組」；在 1953 年 6 月 9 日，省文獻會發給王世慶的「服務證明書」，則敘明王世慶 1949 年 2 月起「在本會任採集組組員」，惟 1949 年 2 月至 1949 年 6 月期間，王世慶任職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該會法定並無「採集組」之設，但此函可說明王世慶當時應已改至省文獻會採集組任職；而在王世慶的回憶中，曾提及：「此時我已由採訪員調到整理組、編纂組擔任組員」；且王世慶擔任組員後期考績皆由時任編纂組組長毛一波初核，故王世慶組員時期應歷任整理、採集、編纂三組。以上參見：「王世慶公務人員履歷表」（1991 年）、「通志館曾今可等任免通知書」（1949 年 06 月 27 日），《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 0040323305848002、「洪緝洽通知解聘」（1951 年 05 月 12 日），〈文獻會人員任免〉，《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 0040323314594008、省文獻會，42 文人字第 1110 號函稿（1953 年），王孟亮藏、王世慶口述，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訪問，《王世慶訪問紀錄》，頁 112、「檢發文獻委員會委派人員王世慶等 42 年度考成結果清冊令希知照轉發由」（1954 年 03 月 02 日），〈省文獻會人員考績〉，《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 0040340025153007。

30 見不著撰人，〈本館館訊七、館務動態〉，《臺灣省通志館館刊》，創刊號（1948 年），頁 53。

31 王世慶，〈六十年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的保管、整理、編譯、運用和研究〉，頁 539-540。

32 「臺灣省通志館正式成立辦公通報案」（1948 年 06 月 28 日），〈各機關成立日期〉，《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 0040110001848012。

33 「省通志館請撥宿舍無可核給令復案」（1948 年 08 月 19 日），〈各機關請撥借辦公室及宿舍〉，《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 0040171002108003。

34 「臺灣省通志館請撥適當房屋以作館址電復案」（1949 年 04 月 30 日），〈各機關請撥借房屋〉，《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 0040171004852020。

志館長久以來的空間問題，並在 9 月 15 日遷至臺北市延平南路與寶慶路口新購置房舍辦公。³⁵

在人事異動上，主任委員林獻堂在房舍問題解決後，不久即赴日「療病」。1950 年 3 月 4 日省府因林獻堂久居日本未歸而將其調任為委員，由副主任委員黃純青升為主任委員。³⁶ 黃純青也因此於 3 月 7 日正式就任省文獻會第 2 任主任委員。³⁷ 然而，在此之前，省文獻會第 1 任採集組組長孫萬枝，突然以「身體衰弱」理由「呈請辭職」，黃純青在真除為主任委員前，將此一辭職案件送進省府。³⁸ 黃純青上任後，4 月 12 日先請協纂廖漢臣暫代採集組組長一職，³⁹ 到隔（1951）年 4 月由陳漢光正式接任採集組長。約在同時，又將原本整理組組長洪緝洽解職，5 月 22 日函請省府同意，由陳漢光再兼整理組組長。⁴⁰ 此一兼職到 1953 年 3 月才改由曾迺碩接任整理組組長，⁴¹ 省文獻會初期單位主管才算大致底定。

35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通告遷址辦公，請查照〉，《臺灣省政府公報》，秋第 65 期（1949 年），頁 944。

36 「林獻堂等動態通知書」（1950 年 03 月 01 日），〈國語推行會人員任免〉，《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 0040323309967004。

37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通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到職日期，請查照〉，《臺灣省政府公報》，春第 59 期（1950 年），頁 864。

38 「據報孫萬枝辭職准予解聘由」（1950 年 03 月 09 日），〈文獻委會人員任免〉，《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 0040323309976011。有關 1950 年 3 月孫萬枝離開省文獻會一案，一說為涉劉明案，劉明時任臺灣省石炭調整委員會，於 1950 年 4 月開始羈押，被控以其怡宏公司款項資助共黨組織；孫萬枝在此案所涉為何，仍有待釐清；另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曾在 1950 年 1 月 29 日被捕，後脫逃再於 4 月 27 日被捕，其後於 8 月間供出孫萬枝曾擔任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財務部門幹部。參見：王世慶口述，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訪問，《王世慶訪問紀錄》，頁 185-186、「蔡孝乾問訊筆錄」（1950 年 8 月 29 日），〈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管理局，典藏號：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2/006、「劉明身分證」（1953 年 3 月 13 日），〈國防部最高軍事法院檢察署〉，檔案管理局，典藏號：AA05000000C/0041/1523/027、國防部「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張志忠、許敏蘭等履歷書」（1957 年 9 月 20 日），〈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典藏號：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4/007。

39 「為文獻會協纂廖漢臣兼理採集組組長准備查兼理期間未便支領組長職務加給希知照由」（1950 年 4 月 20 日），〈文獻委會人員任免〉，《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 0040323309976015。

40 洪緝洽曾在 1924 年與張深切、蔡孝乾、謝雪紅共組「臺灣自治協會」，並任幹部，但由現存檔案，解職原因與其參加「臺灣自治協會」，尚無絕對關聯。見：「洪緝洽通知解聘」（1951 年 5 月 12 日），〈文獻會人員任免〉，《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 0040323314594008、「據報派採集組長陳漢光暫行兼理整理組長職務請核備等情電復知照由」（1951 年 06 月 1 日），〈文獻會人員任免〉，《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 0040323314594008、曾郁明，〈巨變與衝擊：論社會主義思潮對臺灣左翼運動的影響（以 1920~1937 年論述）〉（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頁 145。

41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曾迺碩等任免通知書」（1953 年 3 月 17 日），〈省文獻委會人員任免〉，《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 0040323321310003。

1951 年 9 月 27 日，省文獻會即由陳漢光擬稿，致函當時省政府秘書長浦薛鳳，表示：「致力於通志稿之完成，亟需日據時代總督府之檔案作為參考」由文字內容，似乎此應為省文獻會首次發函給省府秘書處請移交《臺灣總督府檔案》，而由「聞該檔案係貴處所保管，現藏於教育廳地下室內，該處地狹籍多，不能整理，且門窗經常關閉，又無取出曬曝，目下已有部分損壞」，則顯示省文獻會對於《臺灣總督府檔案》的現況，應有透過一定管道的了解。⁴²

省秘書處收到省文獻會函後，在移轉與否的決定上，文書科科長熊昭祺起初態度並不傾向同意，他的意見為：「此項檔案為日人占臺五十年之典籍，擬由府先電中央國史館徵詢意見」，為此，浦薛鳳於 9 月 29 日指示：「有無密件請敘明」，熊昭祺請管卷股股長程餘清查，程餘於 10 月 1 日回復：「據雇員呂傳慶回復：日文檔案中要件及機密件，均為日人焚燬」，浦薛鳳批示：「仍送熊科長扼要敘明，呈主席核」。熊昭祺於是簽陳，其中敘及：「依照中央各機關保存檔案暫行辦法之規定，國史有關之案卷，得委託國史館代為保管，文獻會所請保管運用一節，擬由府先電中央國史館，徵詢意見」。然而省主席吳國楨批示為：「中央所規定，係得委託字，據此，可交文獻會保管運用」因此，10 月 16 日省文獻會接獲來自省秘書處 10 月 15 日回函，主旨是：「准函囑將日文檔案移交保管運用希派員過處洽辦由」。⁴³亦即同意了此項移交。

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志》中所載接收這批檔案時間為 1953 年 7 月。⁴⁴由檔案可以得知，從 1951 年 9 月至 1953 年 7 月，雙方在此段時間有數次的

42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申感文採字第 1551 號函稿（1951 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

43 「准函囑將日文檔案移交保管運用案經陳准照辦希派員過處洽辦由」（1951 年 10 月 15 日），〈日據時期檔案移交文獻會接管案〉，《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0040130020253001。

44 鄧憲卿，《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志》（南投：省文獻會，1998 年），頁 598。

交涉。⁴⁵ 而這段時間陳漢光創辦《臺灣風物》、參加蘭嶼綠島勘查隊，⁴⁶ 籌備「臺灣地方志展覽會」⁴⁷ 以及其中仍待查證釐清的「不幸，這中間遭遇了方的誤會」。⁴⁸ 這些事情，或多或少都對總督府檔案接收時間造成某些影響。

1953年3月，陳漢光免兼整理組長。5月9日省文獻會以42文採字第0880號函請省秘書處，訂「5月20日至5月29日為接交日期」，雙方交接主要由陳漢光與文書科科長熊昭祺、管卷股股長程餘等人負責。⁴⁹ 1955年8月1日省文獻會以44文整字第824號將此次交接檔案製成「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目錄」，函復省秘書處；程餘即以便箋形式說明了本次的交接的狀況：「嗣於42年5月已將編定成冊之日文卷計9,260冊，造冊如數點交該會採集組長陳漢光，接收運去各在案」⁵⁰ 因此，可以說明這次交接在省文獻會主要應是由採集組主導。

從前述44文整字第824號函，1953年12月的《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省文獻會「文獻採集」工作項目中，並無日治時期檔案採集敘述；但是「文獻整理」工作項目中，卻有「（三）收藏日據時期檔案」，實施情形為「接收陳藏」，備考更是「接收清楚（完成）」。⁵¹ 因此，可以推測，雖然交接洽談手續雖仍由採集組進行，但是，檔案接收時，整理組即參與辦理，或者至少也應是採集組接收後，即迅速地移交給整理組管理。

45 「關於日據時期移下檔案擬定接交日期函復照辦」（1953年5月22日），〈日據時期檔案移交文獻會接管案〉，《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0040130020253002。

46 陳漢光，〈雅美族的金銀文化〉《文獻專刊》，第5卷第1、2期（1954年），頁13及〈開發蘭嶼綠島先事交通建設〉，《自立晚報》，1954年4月5日，版2。

47 陳漢光，〈臺灣地方志展覽〉，《文獻專刊》，第3卷第2期（1952年），頁75-77。

48 本刊同人，〈本刊創刊二週年概況〉，《臺灣風物》，第3卷第5、6期（1954年），頁5。亦可參見王世慶口述，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訪問，《王世慶訪問紀錄》，頁180及賴永祥口述，許雪姬、張隆志、陳翠蓮訪談，《坐擁書城：賴永祥先生訪問紀錄》（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7年），頁225。惟此事之詳細來龍去脈受限資料，仍有待更多文獻釐清。

49 「關於日據時期移下檔案擬定接交日期函復照辦」（1953年5月22日），《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0040130020253002。

50 「承囑將日據時期尚未編訂之檔案仍移交整理一節函復同意照辦」（1955年8月19日），〈日據時期檔案移交文獻會接管案〉，《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0040130020253003。

51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42年12月》（臺北：省政府，1953年），頁42-43。

檔案接收後，先放置於延平南路 111 號 3 樓庫房，後來省文獻會購置臺北市長安東路 2 段 36 巷 6 弄 7 之 1 號（後改編為新生北路一段 47 巷 29 號）房舍，⁵² 1955 年 8 月將該批《臺灣總督府檔案》儲藏於此。⁵³ 另外，省文獻會在前述 44 文整字第 824 號函中尚謂：「貴處尚存日據時期尚未編訂之檔案，請仍移交本會整理，以資完全。」針對此點，省秘書處程餘在內部便箋中則謂：「現存第二辦公室檔案儲存室內，尚有一少部分係前行政長官公署遺棄而未列冊移交之散損文件。」因此，程餘認為「似可准予照辦」，並經當時秘書長謝東閔批示「如擬」。

此一未裝訂檔案移交在 1956 年 10 月，亦即省秘書處南遷臺中的前一個月，完成移交，由名為「臺灣省政府秘書處點交—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接收—日據時期文卷清冊」來看，當時已先把兩方點交人員打字臚列，省文獻會部分，包括了主委林熊祥、⁵⁴ 整理組長曾迺碩、組員吳南生、莊金德；而前次負責接收總督府檔案的採集組長陳漢光，並未在原本人員打字名單中，而是後來另以書寫方式補入。因此，可以了解此次文卷點收工作主要由整理組負責，但可能基於採集組採集資料的職權，才又將陳漢光加入本次接收的行列。⁵⁵

王世慶在省文獻會創立之初，原本擔任「管理圖書、繕校文獻資料」等工作，⁵⁶ 1951 年 3 月內政部核定「臺灣省通志凡例綱目」，臺灣省通志修纂

52 鄧憲卿，《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志》，頁 240。另該書頁 595，謂此長安東路房舍購於 1949 年 9 月 10 日，惟當時省文獻會才購置位於延平南路會館，且無其他紀錄顯示此時有購置長安東路房舍，研判日期應較無可能。同書頁 466 則寫為 1961 年購置，亦有疑義。

53 見王世慶，〈六十年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的保管、整理、編譯、運用和研究〉，頁 540。另外其它說為 1956-1958 年間，見〈監察院內政委員會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典藏之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遺失 2 卷，腐損 146 卷，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人員異動時，未辦理移交手續，均有疏失，爰依法糾正案〉，《監察院公報》，第 2705 號（1996 年），頁 2053、李奕興，〈陪臺灣歷史，流浪半個世紀的人〉，《中國時報》，1995 年 9 月 14 日，版 50。報紙資料由王孟亮教授提供，特此致謝。

54 林熊祥於 1954 年 11 月 1 日就任主任委員，見〈函各機關為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林熊祥業於 43 年 11 月 1 日就任，希查照〉，《臺灣省政府公報》，冬第 50 期（1954 年），頁 648。

55 「承囑將日據時期尚未編訂之檔案仍移交整理一節函復同意照辦」（1955 年 8 月 19 日），〈日據時期檔案移交文獻會接管案〉，《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0040130020253003。

56 「檢發該會委派職公務員王世慶等四十年度考成清冊希遵照辦理理由」（1952 年 4 月 22 日），〈文獻會人員考績〉，《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 0040340018652007。

工作算是正式啟動，之後，王世慶負責「土地志地理篇第三章地名沿革」，又與郭海鳴共同分攤「政事志行政篇」，⁵⁷至1955年6月升為編纂，⁵⁸更專職於志書纂修，工作重心也就較與《臺灣總督府檔案》整理較為無涉；但畢竟接收整理《臺灣總督府檔案》為會內大事，無疑王世慶也應在此時對《臺灣總督府檔案》有所初步認識。

叁、王世慶與總督府檔案的典藏管理

1959年中央設置國防研究院，⁵⁹原本擔任整理組組長的曾迺碩，透過張其昀轉任國防研究院工作，因此，該年3月擔任編纂的王世慶轉任整理組長；這個工作直到1969年，王世慶再任編纂為止。⁶⁰

王世慶在這個期間主管省文獻會整理工作，職責為該會典藏幾套史料的管理保存，《臺灣總督府檔案》管理保存，不啻為重要工作。因此，本部分以檔案的儲存庫房、卡片目錄製作、介紹推廣及利用服務四方面敘述來探討。

一、儲存庫房

1955年起《臺灣總督府檔案》放置於省文獻會自購的長安東路庫房。時任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閱覽組組長賴永祥曾敘及，在1959年：「文獻委員會問我是不是可以將這些書（檔案）放到臺大，提供師生利用？」後來省文獻會還派顏晴雲到臺大勘察場地，但最後臺大考量因屬寄存非贈予，最後婉拒。⁶¹

57 盛清沂，〈臺灣省通志纂修始末〉，《臺灣風物》，第26卷第3期（1976年），頁294。

58 李榮聰，〈編後記：從臺灣省通志館採訪員談起〉，《臺灣文獻》，第62卷第1期（2011年），頁39-54。

59 〈「國防研究院」近情〉，《自立晚報》，1959年3月10日，版1。

60 李榮聰，〈編後記：從臺灣省通志館採訪員談起〉，頁39-54。

61 賴永祥於1958年8月8日赴美，1959年9月11日取得美國畢包德師範大學 George Peabody College for Teachers 圖書館學碩士學位返國。如此事發生於1959年，則為9月之後，然而，顏晴雲應在1950年5月15日即向省文獻會請辭獲准，故賴永祥所敘之時間、洽接人物仍有待釐清。參見賴永祥口述，許雪姬、張隆志、陳翠蓮訪談，《坐擁書城：賴永祥先生訪問紀錄》，頁194-195、335、「文獻委員會組員顏晴雲任免通知書」（1950年5月9日），〈文獻委會人員任免〉，《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0040323309976017。

1962 年 3 月行政院又開始重申各機關疏散的急迫性與重要性，⁶² 因此，省文獻會基於「本會歷年所藏保管之文獻、圖書、檔案、資料，均為歷史性之珍品，至為重要，如發生突襲或其他意外損失，無法另行蒐集。」決定疏散包括度藏在臺北的重要資料，並在 1963 年間開始。⁶³ 至於疏散到何處？臺灣文獻館現保留檔案中，僅見 1963 年擬租用中和鄉廟美村永和路 6 號民房作為疏散珍貴資料場所的紀錄，但並未詳敘何項「珍貴檔案」，⁶⁴ 1966 年王世慶《介紹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一文中，則明確指出為中和鄉力行村圓通路 47 號，⁶⁵ 可知當時是較確信的《臺灣總督府檔案》儲放場所。

力行村過去地名為山腳，尚未發展時，人煙稀少，加上靠近外南勢角山，曾任職省文獻會編纂的林栢顯即曾提及當地「因地勢低窪容易潮濕，且空調不良」，因此自 1965 年至 1971 年：

「每年 6、7、8 月，均由省文獻會工作人員吳家憲、莊世宗、何健男、江衍賀、易萬，陳永育、張枝來及邱垂文等 8 位同仁，每天清晨由延平南路辦公廳騎腳踏車，經重慶南路—中正橋—永和

62 〈「政院令各部會嚴格遵行疏散辦公指示」〉，《自立晚報》，1962 年 3 月 23 日，版 1。

63 省文獻會，文主字第 0290 號函稿（1963 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檔案》。此文原稿本為「本會內及新生北路所儲藏之檔案圖書資料」，但後被改為「在臺北市內」。

64 省民政廳，民戊字第 23707 號函（1963 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檔案》。

65 見王世慶，〈介紹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頁 157。該位置（圓通路 47、49 號）約在今日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13-217 號附近，後方為桂永清墓園；此部分承王孟亮教授、范志印先生，及原屋主家族後代邱阿杉先生確認。然而，根據不同撰寫者與回憶時間，疏散地略有不同的敘述：《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志》敘及《臺灣總督府檔案》疏散於圓通路一地；在王世慶〈六十年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的保管、整理、編譯、運用和研究〉一文中，則說當時檔案是疏散到中和鄉力行村圓通路 47 號，而 1964 年則將專賣局檔案遷至中和鄉廟美村；《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中則謂：「1963 年（民國 52 年）5 月初省文獻會奉命配合疏散政策，先後向民間租屋存放於臺北縣中和鄉廟美村林家大厝的護龍及力行村圓通路 47 號林德喜鄉長家中」。實際負責管理《臺灣總督府檔案》的吳家憲的回憶，則為：「三年後再遷往中和某民宅暫居，四年後租約到期，又受迫另覓中和民宅安置。」而監察院公報訪問吳家憲，紀錄為：「（三）五十二年五月搬到臺北縣中和鄉圓通路四合院民房內，（四）五十八年搬到隔壁平房」。在疏散工作告一段落進入省文獻會擔任總務的洪敏麟則說：「《臺灣總督府檔案》則存放在圓通寺附近」。參見：鄧憲卿，《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志》，頁 240、466、660；王世慶，〈六十年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的保管、整理、編譯、運用和研究〉，頁 541；王世慶口述，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訪問，《王世慶訪問紀錄》，頁 133、李奕興，〈陪臺灣歷史，流浪半個世紀的人〉，版 50；〈監察院內政委員會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典藏之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遺失 2 卷，腐損 146 卷，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人員異動時，未辦理移交手續，均有疏失，爰依法糾正案〉，《監察院公報》，卷 2053（1996 年 5 月 15 日），頁 1117-1119；洪敏麟口述，林金田、謝嘉梁訪問，劉澤民紀錄，《文獻人生：洪敏麟先生訪問紀錄》（南投：臺灣文獻館，2010 年），頁 86-87。

—中和，行程約一個多小時，才抵達本會典藏室，然後將典藏室內文獻史料，搬到室外廣場曬太陽，為防止史料遺失及突然下雨，工作人員均寸步不離廣場，至近黃昏時再將曬過的史料搬入典藏室，置於原處。」⁶⁶

林栢顯非省文獻會臺北時期職員，此處說法應屬他人口述而來，部分正確性有待商榷，但大致亦可了解當時省文獻會管理之檔案辛苦。

而這段時期檔案搬遷，王世慶擔任負責管理檔案業務的整理組組長，自然有其繁瑣工作部分，在其後一份公文可知當時新生北路（原長安東路）庫房搬遷計畫，光在時間上，就必須花上 8 天時間。⁶⁷ 而省文獻會同時疏散，不僅《臺灣總督府檔案》，臺拓與專賣局檔案，也因三重庫房颱風淹水問題，最後也搬至中和儲放。⁶⁸ 因此，檔案數度遷移，責任重大，可想而知。

二、卡片目錄製作

根據王世慶先生說法省文獻會在 1963 年前即已完成 1895 至 1906 年卡片目錄。⁶⁹ 而由官方文獻來看，1959 年 1 月，王世慶任省文獻會整理組組長，該年 10 月《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開始有這項工作紀錄：「編製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卡片目錄 800 件」，⁷⁰ 至 1960 年 5 月則：「編製日據時期（明治 29、30 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卡片目錄 6,840 件」，⁷¹ 施政報告延續到 1964 年 5 月，報告中指出：「編製光緒 34 年份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目錄卡 3,096 件」，⁷² 從施政報告可以推測，省文獻會應該在 1959 左右開始製作總督府檔案卡片目錄。而此一製作工作在 1963 年 5 月因檔案疏遷而中斷。⁷³

66 林栢顯，〈六、維護史料，同仁任勞任怨〉，收入鄧憲卿，《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志》，頁 572-573。

67 省文獻會，文主字第 0290 號函稿（1963 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檔案》。

68 此部分可參見王世慶口述，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訪問，《王世慶訪問紀錄》，頁 133。及鄧憲卿，《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志》，頁 572-573。

69 王世慶，〈介紹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頁 172。

70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48 年 10 月》（南投：省政府，1959 年），頁 12。

71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49 年 5 月》（南投：省政府，1960 年），頁 14。

72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53 年 5 月》（南投：省政府，1964 年），頁 15。

73 王世慶，〈介紹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頁 172。

而較具規模的卡片目錄製作計畫，據王世慶所言：「民國五十五年，……，那時候許倬雲教授建議把這批檔案作一份中日文的卡片目錄，讓以後要利用的人檢索」⁷⁴。

而追溯此事，可由 1965 年 8 月王世杰主導下的中研院中美科學合作委員會召集了設計小組，小組召集人為許倬雲、全漢昇，成員包括了陳奇祿，⁷⁵ 1966 年 6 月 15 至 18 日中美人文社會科學會議在臺北召開，除了決議在雙邊設置執行機構，另外共達成 10 項合作計畫，其中一項即為：「在臺北編製有關人文及社會科學書籍及文件的聯合目錄」。⁷⁶ 1966 年後，由許倬雲更具體的建議，將檔案做分門別類，製作類似圖書館書目的目錄卡，提供外界檢索便易，並由許倬雲、陳奇祿等人向美國爭取經費，來執行此一計畫。

此一「編製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卡片目錄」計畫應約在 1967 年底至 1968 年 1 月間獲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委員會正式同意資助，準備利用 1968 年 2 月至 1970 年 1 月約兩年時間完成《臺灣總督府檔案》中 1895 年至 1934 年永久保存檔案、1895 年至 1921 年 15 年保存檔案、舊縣公文類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等目錄編製。⁷⁷

計畫參與人員，除王世慶外，包括了陳奇祿、省文獻會的編輯組長王詩琅，以及預定執行卡片編製作業的莊松林、林勇及周井田等人。莊、林兩人由陳奇祿推薦，自臺南北上。由林勇所留文獻資料可知，莊松林於 1968 年 3 月 25 日抵達中和，先行洽租中和圓通路 49 號房屋，林勇則於 3 月 29 日

74 王世慶，〈六十年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的保管、整理、編譯、運用和研究〉，頁 541。另可參考林聰標、劉石吉執筆，〈迎許倬雲教授到新亞書院講學〉，收入許倬雲，《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45-50。

75 楊翠華，〈王世杰與中美科學學術交流，1963-1978：援助或合作？〉，《歐美研究》，第 29 卷第 2 期（1999 年），頁 57。

76 〈中美人文社會科學會議決定十項合作計劃設立機構規劃執行美代表認我文化對世界極重要〉，《中央日報》，1966 年 6 月 19 日，版 1。

77 「省主席黃杰：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向中美人文科學研究會申請補助款，計畫於兩年內將臺灣總督府時代之重要檔案譯成中文案。」（1968 年 1 月 22 日），〈臺灣省政府首長會議第 103 次會議〉，《臺灣省政府委員會會議》，臺灣文獻館（原件：檔案管理局），典藏號：00502010309。另亦可見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函稿，文主字第 0094 號（1968 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檔案》。

北上會合，兩人次日同赴省文獻會報到，並拜訪陳奇祿、毛一波等人，⁷⁸ 在 4 月 3 日兩人正式開始進行工作。⁷⁹

此時距原訂計畫開始時程，已有延宕。而中間亦有不少人事上的意外，對計畫執行受到一定影響：例如 1969 年 2 月 4 日，林勇突然身體不適，返回臺南，經醫師許嘉堯診斷為急性肝炎，在臺南調養 2 個多月；⁸⁰ 1969 年 3 月，王世慶也離開整理組組長職務，調任編纂，整理組組長改由吳南生接任。⁸¹

然而影響最大的，應該在於檔案數量與作業複雜度，遠遠超過預估，使得在 1969 年 10 月，計畫約僅完成 113,320 張卡片目錄，只達約 33% 進度。⁸² 林勇在 1968 年 4 月 3 日所載：「由檔案明治卅年甲種一冊辦起，至下午十一時停息，計之只完成其一半而已」。⁸³ 而林勇自行統計第 1 個月自己的執行進度，約莫 1 個月時間僅完成 813 件，計 22 卷，⁸⁴ 依此進度，僅數人之力，要完成龐大檔案所有目錄，確實有相當難度。

當時，省文獻會有意延長計畫時程，王世慶雖已非整理組長，仍由其簽辦計畫，函請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委員會延長執行期程，由原本 2 年，增加至 5 年。在函稿中，王世慶敘明此一計畫預估與實際進度上的差異的緣由：原本預估總督府檔案每冊 25 件，每件卡片字數 60 字，每人每半日可執行 50 件，3,000 字，但實際執行後發現，每冊平均超過 40 件，每件卡片字數超過 80 字，

78 〈莊松林致信林勇說明北上準備作業〉（1968 年 3 月 26 日）、〈林勇北上準備進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造臺灣總督府檔案目錄卡工作〉（1968 年 3 月 29 日），「國家文化記憶庫」網站：memory.culture.tw（2022 年 11 月 25 日點閱）。

79 〈林勇與莊松林開始進行工作，並規劃整理流程〉（1968 年 4 月 3 日），「國家文化記憶庫」網站：memory.culture.tw（2022 年 11 月 25 日點閱）。

80 〈林勇年譜手稿（1966 年-1981 年）〉，「國家文化記憶庫」網站：memory.culture.tw（2023 年 5 月 30 日點閱）。

81 參見「王世慶公務人員履歷表」（1991 年），收於《王世慶人事資料》及鄧憲卿，《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志》，頁 543。

82 省文獻會，文編字第 0947 號函（1969 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檔案》。

83 〈林勇與莊松林開始進行工作，並規劃整理流程〉（1968 年 4 月 3 日），「國家文化記憶庫」網站：memory.culture.tw（2023 年 5 月 30 日點閱）。

84 〈整理總督府檔案目錄—整理進度紀錄〉，「國家文化記憶庫」網站：memory.culture.tw（2023 年 5 月 30 日點閱）。

而每人每半日實際僅能執行 30 件，2,400 字。⁸⁵

但後來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委員會並未同意延長此一計畫；1970 年 2 月 28 日林勇、莊松林兩人結束中和工作，返回臺南，宣告計畫正式結束。⁸⁶ 而計畫期間大致完成了 1895 年至 1921 年永久保存卡片目錄部分。⁸⁷ 在王世慶第 1 次自省文獻會退休後，卡片編製工作後來又進行了一陣子，1974 年王世慶指出：「近年該會又專案繼續再整理翻譯該檔案卡片目錄」，⁸⁸ 在 1974 至 1976 的省府施政報告陸續有相關紀錄，然而在 1976 年度後，即無紀錄，此次累計的卡片數量，粗估只在 2 萬張左右，⁸⁹ 遠低於莊松林、林勇完成數量。毛一波在〈臺灣省文獻會的業績〉一文指出《臺灣總督府檔案》「另編有目錄卡片，至今只做到明治時期，已有五萬六千六百零三件」，此「只編到明治時期」及卡片數量說法雖異於前述省文獻會說法，但說明了卡片目錄並未完成。⁹⁰

然而，卡片目錄編製計畫，雖然無法延續，但 1983 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呂實強、李孝悌、孫斌考察當時已遷至臺中的省文獻會，謂：「上面這些檔案，大部分都已整理完畢。所有的檔案都編有目錄卡片，翻檢相當方便。」⁹¹ 此一說法雖恐係考察參觀時間有限，倉促判斷所致，但這些卡片主要為永久保存檔案、15 年保存檔案，對檢索總督府檔案有一定助益。

省文獻會原本的卡片目錄亦依照日治時期年度、保存別、門類排序，和

85 省文獻會，文編字第 0947 號函（1969 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檔案》。

86 鄭喜夫，〈莊松林年譜〉，《臺灣風物》，第 25 卷第 2 期（1974 年），頁 5-33。

87 省文獻會，文編字第 0947 號函（1969 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檔案》及王世慶，〈臺灣史料的調查與介紹〉，《臺灣風物》，第 25 卷第 4 期（1974 年），頁 16。

88 王世慶，〈臺灣史料的調查與介紹〉，頁 16。

89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63 年 3 月》（南投：省政府，1974 年），頁 12、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64 年 3 月》（南投：省政府，1975 年），頁 10、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64 年 9 月》（南投：省政府，1975 年），頁 12、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65 年 3 月》（南投：省政府，1976 年），頁 12。

90 毛一波，〈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業績〉，收入毛一波，《古今臺灣文獻考》（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77 年），頁 162-172。

91 呂實強、李孝悌、孫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及臺中市收藏有關臺灣史料初步調查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2 期（1983 年），頁 496。

《現藏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目錄》的排序方式並無太大差異，原本每冊目錄普通約僅 2-4 張，製成卡片後，反而有數十張至百餘張，翻閱卡片，除了節省調閱原目錄時間外，但相較翻閱書本式目錄來說，反顯費時。

1988 年 2 月，中研院近史所與省文獻會合作，由許雪姬擔任執行編輯，直接影印每冊《臺灣總督府檔案》目錄，製作完成書本式《現藏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目錄》，⁹² 上架開放利用後，反較翻閱卡片便捷，卡片目錄失去原本優勢，讀者也改為直接翻閱該套書本式影印目錄。

由臺灣文獻館現保留《臺灣總督府檔案》卡片目錄（圖 1），確實有兩種型式卡片。兩種卡片皆為一件填寫一張，最大差異，在事由部分，第 1 種（圖 2、3）為直接抄錄日文「事由」，背面僅有「備考」欄，主要為日本領臺初期檔案；第 2 種（圖 4、5）則為「中譯事由」，背面除有「備考」欄外，另有「事由原文」，主要為明治晚期和大正年間檔案。

第 2 種卡片目錄符合林勇日記所述：

- 一、先抄錄公文目錄於卡片，如保別、年號、法案日期及卷數，國元與西元、門別、類別、檔冊目錄號碼、原議號碼（以上前面），而留中譯事由，以待全部填完後為之。
- 二、卡裡面填事由原文。⁹³

因卡片並無確切落款與製作日期，然而第 1 種卡片主要涵蓋明治領臺後至明治中後期，較可能為省文獻會早期自行製作卡片目錄，第 2 種卡片則涵蓋明治後期、大正年間，且有林勇所謂的「中譯事由」，推測較有可能為林勇、莊松林所製作卡片目錄。

92 有關《現藏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目錄》製作，可參考許雪姬，〈我與臺灣總督府檔案的整理與編目〉，收入中央研究院日治時期檔案整理小組編，《臺灣總督府檔案數位化整理紀要》（臺北：中研院，2002 年），頁 37-45。

93 〈林勇與莊松林開始進行工作，並規劃整理流程〉（1968 年 4 月 3 日），「國家文化記憶庫」網站：memory.culture.tw（2023 年 5 月 30 日點閱）。

三、檔案介紹推廣

《臺灣總督府檔案》自 1953 年開始移轉省文獻會後，1954 年由省文獻會主導成立的方志研究會出版《修志方法論集》，該書由毛一波主編，其中收錄省該會編纂廖漢臣〈臺灣史料的蒐集〉⁹⁴一文，即有介紹《臺灣總督府檔案》已由省文獻會接收。然而，後續有關總督府檔案的介紹，卻不多見，例如在書目方面，只有 1958 年賴永祥的〈臺灣文獻舉要〉中提及此一名稱，⁹⁵而林熊祥 1958 年發表〈本省十年來的文獻工作〉一文，對《臺灣總督府檔案》亦僅數語和統計圖表帶過，並未多做介紹。⁹⁶

1963 年 4 月王世慶於文獻研究會主講〈文獻資料的整理和保存〉，講述內容經整理發表於該年底《臺灣文獻》季刊，則有提及《臺灣總督府檔案》正在進行卡片目錄編纂。⁹⁷同月，則有〈省文獻會藏書，歡迎借閱參攷〉報導中則指出：「臺灣總督府檔案中之公務員任免案、醫師藥劑師及助產士執照案、土地房屋案、寺廟案、山林原野放領（註：原文為項）放租案、申請礦區案、抗日義士蹟案……。該會為發揮功能，協助人民解決問題，正計畫擴大對外服務、歡迎各界人士前往借閱參考，並受理查復各有關文獻問題。」⁹⁸

1966 年 2 月 28 日，延續原本國立臺灣大學 20 周年文學院座談會而產生的「臺灣研究研討會」，進行第四次研討會。這次研討會，不似一般研討只限於室內辦理。當日參加者先在省文獻會聽取說明外，後實地到位於中和鄉牛埔仔的省文獻會「檔案保管室」參觀，此一「檔案保管室」存有《臺灣總督府檔案》，後山即桂永清墓園，應即為中和鄉力行村圓通路 47 號庫房。

由紀錄上來看，如此大規模的開放《臺灣總督府檔案》庫房參觀，應該

94 廖漢臣，〈臺灣史料的蒐集〉，收入毛一波，《修志方法論集》（臺北：方志研究會，1954 年），頁 101-102。

95 賴永祥，〈臺灣文獻舉要〉，《臺灣文獻》，第 9 卷第 2 期（1958 年），頁 9。

96 林熊祥，〈本省十年來的文獻工作〉，《臺灣文獻》，第 9 卷第 1 期（1958 年），頁 51-64。

97 王世慶，〈文獻資料的整理和保存〉，《臺灣文獻》，第 14 卷第 4 期（1963 年），頁 233-238。

98 〈省文獻會藏書，歡迎借閱參攷〉，《臺灣民聲日報》，1963 年 4 月 4 日，版 2。

是省文獻會首次。⁹⁹ 此次參訪所留資料，除了策劃者方豪撰寫〈參觀臺灣總督府檔案的動機和感想〉一文，還有省文獻會整理組編寫〈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簡介〉¹⁰⁰，該簡介雖經重新打字排版，但應該也是目前所見最早的省文獻會官方對《臺灣總督府檔案》簡介。

該簡介與今日較大不同在於提出了「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分類表」將總督府檔案分為 19 門。而另外對未來保存工作，提出了三項計畫：（一）繼續編製全檔之卡片目錄。（二）逐年拍攝顯微（縮影）照片，以利保存。（三）分類翻譯各部門之檔案——例如「抗日檔」「外事檔」以資文獻之流通。

或許受此一參訪學者影響，當年年底王世慶即在《臺灣文獻》季刊發表〈介紹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相較於〈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簡介〉一文，只有簡薄數頁，這篇文章，可以說是將《臺灣總督府檔案》較有系統完整地呈現在研究者眼前，也成為很多學者後來入門《臺灣總督府檔案》不得不先研讀的文章，可印證翁佳音謂：「後來王世慶先生還與吳家憲先生合作，對該檔案加以分類整理，並撰寫〈介紹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給予後來的研究者可按圖索驥的便利之處。」¹⁰¹

該文（以下稱王世慶版）主要由兩個部分構成。一為總督府檔案的構成分類，二為總督府檔案的數量目錄。考察這兩部分的資料來源，構成分類介紹和臺灣文獻館現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分類板」極為相似，¹⁰² 這些分類板材質、書寫均不一，何人何時所做，尚待釐清。¹⁰³ 但比較日治時期所制

99 在之前，例如 1961 年 10 月 11 日省議會民政小組，參訪省文獻會，該會亦僅於該會辦公室場場展示《臺灣總督府檔案》，並無大規模開放參觀《臺灣總督府檔案》庫房記錄。見編纂組，〈省議會民政小組巡視本會〉，《臺灣文獻》，第 12 卷第 4 期（1961 年），頁 177-180。

100 見方豪，〈參觀臺灣總督府檔案的動機和感想〉，收入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編，《臺灣研究研討會紀錄》（臺北：臺灣大學人類學系，1968 年），頁 66-67 及省文獻會整理組編，〈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簡介〉，收入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編，《臺灣研究研討會紀錄》，頁 67-70。

101 翁佳音，〈功在臺灣文獻學術界的王世慶先生〉，頁 87-88。

102 此部分可參考東山京子，〈門類別分類から見た臺灣總督府文書研究〉，頁 1-73。

103 有關分類板介紹可見張谷源，〈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分類板簡介〉，《臺灣文獻別冊》，第 4 期（2003 年），頁 2-7。在該文中張谷源認為為日本人所作。

定的分類規定，與實際分類，以明治 1896 年 9 月至 1897 年為例，此在王世慶版對應「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分類表（二）」，而回溯該分類的法源為 1896 年所制定「民政局記錄分類規則」，在該規則中「官規及官職」門下分 16 類，其中並無「官衙」、「定員」兩類，¹⁰⁴ 然而實際的檔案目錄分類中卻有此兩類，而王世慶版中亦有此兩類。因此，推測王世慶版的分類介紹，如果不是依據分類板，則是整理自實際公文目錄而來。其餘筆者未見無分類板，而有分類介紹，主要為《舊縣公文類纂》及《臺灣總督府臨時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應是直接由各副全宗下目錄整理而來。¹⁰⁵

而相較於前述官方版「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分類表」中「19 門分類表」，該表並非實際公文類纂所存在的分類，但與王世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分類表（三）」（1898-1904）較為相近，然而，卻又有許多地方不同。例如「19 門分類表」的「官規及官職」即高達 23 類，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分類表（三）」中「官規官職」卻只有 19 類。這「19 門分類表」從何產生？是否即為翁佳音所述「後來王世慶先生還與吳家憲先生合作，對該檔案加以分類整理」，¹⁰⁶ 有待釐清。不過，或許可能在目錄編製過程中的諸多考量，而滾動修正，在王世慶一文已未提及此一「19 門分類表」。

數量目錄部分，主要係依據 1955 年 8 月 1 日省文獻會 44 文整字第 824 號函所附「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目錄」（以下稱省文獻會版），另外也整合了原本未在目錄中，而在「臺灣省政府秘書處點交—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接收—日據時期文卷清冊」未裝訂部分的清單。

而原本省文獻會在 1953 年 5 月 9 日以 42 文採字第 0880 號函請省秘書處移轉檔案，省秘書處承辦人程餘在簽陳此來文時，亦附了一份「秘書處文

104 「記錄規則制定ノ件」（1896 年 9 月 23 日），〈明治二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甲種永久保存第五卷恩賞文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60026。

105 在王世慶《介紹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一文中，《臺灣總督府檔案》現未發現分類之部分，皆在整理表格處備註「本表係據該檔案實有門類編列」。見王世慶，〈介紹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頁 169、171。

106 翁佳音，〈功在臺灣文獻學術界的王世慶先生〉，頁 87-88。

書科接收前總督府文卷移交清冊」(省秘書處版)，推測省文獻會、秘書處兩方點交接收，及省文獻會目錄製作時，亦多依據此份清冊。

這三份清冊目錄各有不同，王世慶版內容，與省文獻會版較為接近，但訂正了不少省文獻會版的錯誤，例如省文獻會版許多的冊數，較省秘書處版有多或少的狀況，都被一一訂正；另外在舊縣公文類纂排序部分，原本省秘書處版與省文獻會版順序即有不同，王世慶把此部分大多依各縣市位置，由臺北縣開始，較接近逆時針方向排序，不論在理解或管理上，多有所助益。

四、檔案利用服務

《臺灣總督府檔案》除了學術上的用途，因其在日治時期即為一般行政文書，戰後初期，仍難完全去除原有行政文書性質，故一般公文書之應用，亦存於《臺灣總督府檔案》中。如前述，戰後政府接收《臺灣總督府檔案》，當時省政府秘書處雖號稱「本府成立迄今，從未有人調閱」檔案，但因距離最早檔案生產時間，頂多五、六十年，更何況許多昭和年間檔案，在王世慶擔任組長時期，亦頂多二、三十年時間，仍具有一定實際公文書潛在功用。因此，本處以提供一般用途，及提供學術用途兩項說明。

(一) 提供一般用途

在〈二年來本省文獻問題之解答彙報〉中，¹⁰⁷ 王世慶即提及下列幾個案例，均由《臺灣總督府檔案》中提供資料：

1. 因應修志需要：1959 年 10 月臺東縣文獻委員會為編纂志稿，請省文獻會提供臺東廳主管姓名及任卸職年月，由明治 28 年永久甲種第 3、4 卷等提供。
2. 齒科專門標示證明：1959 至 1960 年有陳英方、陳江山、蔡來章，希望能提供齒科標示醫師證明，由大正 9、11、12 年 15 年保存等案卷提供。

107 不著撰人，〈二年來本省文獻問題之解答彙報〉，《臺灣文獻》，第 12 卷第 2 期（1961 年），頁 127-140。

3. 教育部專業資格證明：教育部函請將陳英方、陳江山、蔡來章及莊燈之齒科標示醫師證明，提供該部參考，由大正 11 年 15 年保存等第 2、3 卷等提供。
4. 參加抗日遭判刑證明：1960 年 9 月黃阿烈子黃王泉要求提供其父參加革命並遭判刑證明，由大正 3 年永久保存等第 17、38 卷等提供。

1963 年 4 月份文獻研究會中，王世慶亦同樣提及不少類似的案例。¹⁰⁸ 在王世慶的口述中，他認為當時主任委員方家慧的政策，值得一書：「接受我的提議，不妨仿效美國國家圖書館，提供民眾諮詢的功能，他在 1963 年（民國 52 年）登報，告知民眾，省文獻會有此項功能。」¹⁰⁹ 此可在當時報刊〈省文獻會藏書，歡迎借閱參攷〉一文中做驗證，該報導謂：「該會為發揮功能，協助人民解決問題，正計畫擴大對外服務，歡迎各界人士前往借閱參考，並受理查復各有關文獻問題。」¹¹⁰ 而曾任省文獻會主任委員方家慧的回憶錄《浮生紀實》中，曾提及其「開放日據時期檔案，供民眾查詢」，則省文獻會檔案至少應自 1963-1964 年間即開始開放外界查詢。¹¹¹ 但目前並無明確的官方紀錄，方家慧此一說法雖可提供參考，仍需其他旁證。

這些應用，在當時只有紙本目錄與部分卡片目錄的狀況下，有些諮詢事項並無法在總督府檔案中發現，例如 1960 年 11 月財政廳公產室詢問明治救濟會、大正救濟會相關事項，¹¹² 雖然在《臺灣總督府檔案》中也有相關檔案，但當時省文獻會即另外由府報或其他資料回復諮詢者。另外這種諮詢事項，在 1963 年之後，因日治時期工作人員陸續退休，而使得相關年資查詢部分

108 王世慶，〈文獻資料的整理和保存〉，《臺灣文獻》，第 14 卷第 4 期，頁 238。

109 王世慶口述，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訪問，《王世慶訪問紀錄》，頁 173-174。

110 〈省文獻會藏書，歡迎借閱參攷〉，《臺灣民聲日報》，1963 年 4 月 4 日，版 2。

111 方家慧，《浮生紀實》，無出版項，頁 56。

112 例如：「內田嘉吉恩賜財團明治救濟會設立許可並告諭第二號ヲ以テ至孝至仁ノ御趣旨ヲ諭ス」（1912 年 11 月 22 日），〈大正元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二十九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1939043。

增加，全年諮詢 42 件，甚至有「增設服務臺」之議；¹¹³到 1966 年時，相關諮詢數量則增至 127 件。¹¹⁴

（二）提供學術用途

在提供學術用途上，本來即因修纂通志，而「亟需日據時代總督之檔案作為參考」，然而省文獻會如何提供《臺灣總督府檔案》供修纂通志者查閱，或者修纂通志者應透過何種手續進入庫房查閱《臺灣總督府檔案》，似未見相關記載。

然而，如前所述，賴永祥曾敘及，在 1959 年：「文獻委員會問我是不是可以將這些書（檔案）放到臺大，提供師生利用？」¹¹⁵因此，就某種程度而言，省文獻當時，亦仍有思索《臺灣總督府檔案》的開放使用，而非僅將《臺灣總督府檔案》做為內部參資料。然而，比較可確認的開放，仍為上述方家慧的回憶錄《浮生紀實》中所述，約在 1963-1964 年間。¹¹⁶

在王世慶的口述中，亦可佐證：「讀者若需借閱檔案，則必須於前一天送出借書單，然後由省文獻會工友由延平南路辦公室騎車到中和疏散書庫去拿書籍、隔天才看得到書籍檔案的特殊現象。或直接到疏散書庫借閱資料……。」則說明已有簡單的借閱檔案制度，王世慶更指出國外學者中第一位使用《臺灣總督府檔案》的藍厚理（Harry J. Lamley）即曾騎腳踏車到中和書庫借閱檔案。¹¹⁷

另外一案例為辜多曼（Grant K. Goodman），欲研究日本佔領下的菲律賓獨立運動，最後輾轉來臺尋找相關檔案，亦由王世慶帶其至中和書庫，並

113 總務組，〈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第二十一次委員會議〉，《臺灣文獻》，第 14 卷第 1 期（1963 年），頁 189。

114 張俊仁，〈臺灣省縣市文獻工作會報紀錄〉，《臺灣文獻》，第 17 卷第 3 期（1966 年），頁 193-195。

115 賴永祥口述，許雪姬、張隆志、陳翠蓮訪談，《坐擁書城：賴永祥先生訪問紀錄》，頁 194-195。

116 方家慧，《浮生紀實》，頁 56。

117 藍厚理任教夏威夷大學，於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攻讀博士期間，曾於 1963 年 9 月至 1964 年 5 月來臺，期間曾至書庫查閱《臺灣總督府檔案》，參見：王世慶口述，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訪問，《王世慶訪問紀錄》，頁 132-134、不著撰人，〈訪問藍厚理先生〉，《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 2 期（1987 年），頁 16-18。惟〈訪問藍厚理先生〉一文將中和書庫誤植為臺中書庫。

透過吳家憲協助，尋找是否有檔案相關紀錄。¹¹⁸

在國內學者部分，王世慶曾舉出方豪想找出史料佐證孫文來臺，所以請其代為尋找資料，但只在收發件名簿（登記簿）中，找出有孫中山來臺的文件記錄，原件已遭銷毀。¹¹⁹ 方豪後來與陳奇祿商議，即促成前述「臺灣研究研討會」參訪省文獻會中和書庫。¹²⁰

相較外界，在省文獻會工作上與《臺灣總督府檔案》相關人員，則有較多機會可直接應用檔案。例如前述製作目錄卡片的林勇，在工作期間即留下相當多筆記，其中「安平地區鴉片煙膏吸食」，¹²¹ 即林勇在工作之餘，筆記下《臺灣總督府檔案》的內容。莊松林亦曾表示：「民國五十七年，我與安平林勇兄被省文獻委員會聘為協助整理日據時代五十年臺灣總督府檔案時，偶然在明治三十年第六卷十二號發現陳修五親自書寫履歷書一紙，此件實屬珍貴，隨即抄錄日記簿。」¹²² 另所譯〈日據初期踏查龜山島兩篇記錄〉，亦出自《臺灣總督府檔案》。¹²³

然而，在早期，「臺灣研究」並非顯學，而以日治時期作為研究主題者，更是寥寥可數，前述「臺灣研究研討會」，雖舉辦了數次，但也只有上述 1966 年 2 月 28 日那次是以《臺灣總督府檔案》為研討中心，其餘場次多探討清代與早期臺灣；¹²⁴ 《臺灣風物》曾整理臺灣相關研究碩博士論文，在

118 辜多曼任教堪薩斯大學，見王世慶口述，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訪問，《王世慶訪問紀錄》，頁 138-139 及王世慶，〈介紹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頁 172。

119 王世慶口述，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訪問，《王世慶訪問紀錄》，頁 138。此亦可參見：方豪〈研究國父來臺次數的經過〉，《方豪六十自定稿上》（臺北：學生書局，1969 年），頁 1169-1184。

120 方豪，〈參觀臺灣總督府檔案的動機和感想〉，頁 66-67。

121 〈林勇撰寫「安平地區鴉片煙膏吸食」筆記〉，「國家文化記憶庫」網站：memory.culture.tw（2023 年 5 月 30 日點閱）。該條目應出自「臺南縣告示第四一號」（1897 年 5 月 31 日），〈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二十五卷文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0170042X001。

122 莊松林（朱鋒），〈導引日軍無事進入臺南城的陳修五的履歷書〉，《臺灣風物》，第 22 卷第 4 期（1969 年），頁 43-44。

123 莊松林（朱鋒）譯，〈日據初期踏查龜山島兩篇記錄〉，《臺灣風物》，第 20 卷第 1 期（1969 年），頁 46-53 及「龜山島探險〔狀況〕宜蘭廳報告」（1897 年 10 月 26 日），〈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0148015。

124 〈目錄〉，《臺灣研究研討會紀錄》，頁 iii-iv。

1970 年前，僅有 14 篇，專門研究日治臺灣僅有兩篇。¹²⁵ 從相關的紀錄來看，王世慶不斷向學界推介檔案利用，並且亦曾說：「早期省文獻會並沒有禁止對外開放檔案」¹²⁶。但受限於庫房疏遷中和，借閱不便，和學術氛圍所所致，早期利用率確實不高。

肆、王世慶與總督府檔案的論著研究

省文獻會本來即基於「致力於通志稿之完成」，故「亟需日據時代總督之檔案作為參考」，其原意本來即非典藏保存，而在於如何應用到修纂志書上。後來，因修志以外的業務或者會外人士的需要，總督府檔案也衍生了其他的應用。本部分以翻譯選編、通志及期刊等各項來做說明討論。

一、翻譯選編

在檔案翻譯選編部分，王世慶曾提及：「文獻會在通志整修完成以後，就把經費移到翻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的工作上」。¹²⁷ 然而，在此之前，省文獻會即有進行檔案翻譯工作。

125 本社編輯部，〈歷年臺灣各大學研究所有關臺灣文史研究博碩士論文目錄〉，《臺灣風物》，第 32 卷第 1 期（1982 年），頁 102-105。

126 在《王世慶訪問紀錄》頁 139 提及「早期不允許對外開放資料」，此應係針對國際學術合作計畫而言，例如，1962 年中村孝志、岩生成一、1966 年至 1967 年左右馬若孟（Ramon Myers）、1976 年日本近代史研究會，皆曾向省文獻會提出，將《臺灣總督府檔案》翻拍成微捲的合作計畫，以馬若孟（Ramon Myers）所提合作計畫為例，王世慶當時擔任整理組長，還曾為此赴國立政治大學考察，然而最後，省文獻會憂懼「檔案資料外洩」，因此並未同意合作製作微捲。而至 1981 年開始日本中京大學每年皆至省文獻會進行調閱《臺灣總督府檔案》，剛開始亦不順利，此亦可參見《王世慶訪問紀錄》頁 204，後經蘇俊雄、王啟宗、施金池等人協調，才得以進行。為此，1986 年省文獻會訂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資料外賓閱覽資料須知」，雙方並在 1992 年簽定學術合作協議書。這也是極可能 1989 年黃紹恆至省文獻會查閱資料時，吳家憲告知「檔案裡頭有許『敏感』的內容」，且「據說當時是不允許日本人看得」。然而，1980 年代後臺灣史研究者漸增，卻也因省文獻會與中京大學簽定協議書，而造成日本學者可以影印「檔案目錄」，但臺灣學者只能「抄錄」；日本學者有合約法源可以閱覽檔案原件，臺灣學者卻無合約依據，造成閱覽落差。另外前述 1996 年監察院內政委員會調查省文獻會《臺灣總督府檔案》狀況，檔案開放應用制度化成為該會重要課題，因此，省文獻於 1998 年訂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典藏檔案閱覽須知」，開始統計閱覽人數，並編印《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特藏日據時期檔案簡介》手冊提供學界參考，才算《臺灣總督府檔案》較正式公開開放。參見王世慶口述，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訪問，《王世慶訪問紀錄》，頁 139、151、204、黃紹恆，〈臺灣總督府檔案的周邊與其運用〉，檜山幸夫等，《臺灣總督府檔案之認識與利用入門》（南投：省文獻會，2002 年），頁 156-157 及蕭富隆、蔡麗卿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特藏日據時期檔案簡介》（南投：省文獻會，1999 年），頁 52。

127 王世慶，〈六十年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的保管、整理、編譯、運用和研究〉，頁 543。

在 1955 年 6 月省政府施政報告，省文獻會將「整理日據時期余清芳抗日事件資料」納入「資料整理工作」¹²⁸ 其後多次施政報告中，亦出現多次「編製日據中期本省英烈事蹟紀錄卡」等相似條目。¹²⁹ 足見當時抗日義士史蹟為省文獻會重要整理工作項目。而 1955 年更有「余清芳抗日資料編譯完成」紀錄。¹³⁰ 1956 年則是「有關羅福星及余清芳抗日資料初步編譯完成」，當時完成進度約達 70%，¹³¹ 1958 年，「譯訂羅福星余清芳等抗日文獻 6 萬字」，進度達 95%，¹³² 而據林熊祥的文章，則「翻譯余清芳抗日事件檔」，在 1954、1955 兩個年度進行，每個年度 5 萬字，「翻譯羅福星抗日事件檔」，在 1956、1957 兩個年度進行，1956 年度 5 萬字，1957 上半年 10 萬字。¹³³ 兩者數量說法略有不同，但應可確信當時省文獻會政策性推動抗日事件檔案翻譯。

然而，1958 年後省政府施政報告中即無出現相關總督府抗日檔案翻譯紀錄。而據方家慧回憶錄，1963 至 1964 年其任職期間，曾「擬就檔案記載，編譯分成政治、經濟、社會等篇，公諸當世」。¹³⁴ 在 1965 年省府施政報告「編印文獻 - 專題研究」項下，則出現「分歷史、民族、文化等三大項目進行調查研究」，¹³⁵ 此與方家慧所謂「政治、經濟、社會等」等篇，有所出入。1966 年則將上述進行中「調查研究成果，以單行本出版及刊載臺灣文獻專刊者，計羅福星抗日革命全檔，暨臺灣抗日忠烈錄第一輯各一冊」。¹³⁶

此處所謂羅福星抗日革命全檔，即 1965 年，莊金德、賀嗣章編譯《羅

128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44 年 6 月》（臺北：省政府，1955 年），頁 40。

129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50 年 11 月》（南投：省政府，1961 年），頁 20。

130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44 年 12 月》（臺北：省政府，1955 年），頁 353。

131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45 年 6 月》（臺北：省政府，1956 年），頁 336。

132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47 年 6 月》（南投：省政府，1958 年），頁 14。

133 林熊祥，〈本省十年來的文獻工作〉，《臺灣文獻》，第 9 卷第 1 期（1958 年），頁 59。

134 方家慧，《浮生紀實》，頁 56。

135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54 年 6 月》（南投：省政府，1965 年），頁 9。

136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55 年 6 月》（南投：省政府，1966 年），頁 9。

福星抗日革命案全檔》。¹³⁷ 賀嗣章為湖南人，早期任職滿洲國，與岸信介為好友，進入省文獻會時，即約 70 歲高齡，該書出版已近 85 歲，早應已退休。¹³⁸ 然而據王孟亮所言，《羅福星抗日革命案全檔》主要係莊金德依據賀嗣章譯稿，整理出版。¹³⁹ 如此，則似與施政報告中 1958 年，「譯訂羅福星余清芳等抗日文獻 6 萬字」，進度達 95%，狀況相符。同年亦出版張俊仁所編《臺灣抗日忠烈錄（第一輯）》，¹⁴⁰ 然而，《臺灣抗日忠烈錄（第一輯）》並非直接引用《臺灣總督府檔案》內容，研判或許來自前述整編之「英烈事蹟紀錄卡」。

而王世慶自行翻譯作品，先在 1955 年前有 4 份，包括了〈諸蕃志之談馬顏國〉、〈臺灣高砂族語言的分類〉、〈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臺灣番社戶口表〉及〈日本國會議會紀錄中的霧社事變〉¹⁴¹，前面三篇的翻譯都相當短，可算是就單篇文章中的摘譯；後一篇則譯自議事錄。以 1931 年 1 月 24 日淺原健三質詢霧社事件為例，先刊於 1931 年 1 月 25 日《官報》號外，¹⁴² 復刊於當年度出版議事錄中。¹⁴³ 兩者內容十分相近，差異不大，無法判斷王世慶

137 莊金德、賀嗣章編譯，《羅福星抗日革命案全檔》（臺北：省文獻會，1965 年）。

138 1961 年省文獻超齡人員皆奉准退休，賀嗣章至遲應於此時退休。見鄧憲卿，《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志》，頁 603。

139 張家榮，〈文獻「名人」賀嗣章〉，《臺灣文獻館電子報》，第 209 期（2021 年）。

140 張俊仁，《臺灣抗日忠烈錄（第一輯）》（臺北：省文獻會，1965 年）。另張俊仁籍貫福建，為福建協和大學文學士，原任職省政府秘書處編輯室編譯兼股長，1957 年奉命由臺北疏遷至中興新村，1960 年免兼股長，1963 年 6 月借調至文獻會擔任，「秘書處編輯室編輯員張俊仁委代案」（1946-02-19），〈秘書處人員任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03230031026、「張俊仁等於四十七年元月四日疏遷中部辦公」（1957-12-27），〈本府疏遷中興新村（0046/017/5/2）〉，《臺灣省級機關》，典藏號：0040170026788002、「本府秘書處荐任編譯兼編譯室第一股股長張俊仁免去兼職、派兼袁聿珊為本府秘書處編譯室第一股股長、調派代馮國寰為本府秘書處荐任編譯」（1960-11-26），〈秘書處人員任免（0049/032.3/2390.4/3）〉，《臺灣省級機關》，典藏號：0040323027189007。

141 金關丈夫原著，王世慶譯，〈諸蕃志之談馬顏國〉，《方志通訊》，第 3 卷第 3-4 期（1954 年），頁 16-19（本篇內容後亦收入王世慶，〈蘭嶼歷史地理雜識〉，《臺灣文獻》，第 9 卷第 2 期（1958 年），頁 40-41、淺井惠倫原著，王世慶譯，〈臺灣高砂族語言的分類〉，《臺灣文獻》，第 6 卷第 4 期（1955 年），頁 57-58、中村孝志原著，王世慶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臺灣番社戶口表〉，《臺灣文獻》，第 6 卷第 4 期（1955 年），頁 67-68、王世慶譯，〈日本國會議會紀錄中的霧社事變〉，《臺灣文獻》，第 6 卷第 3 期（1955 年），頁 105-130。

142 〈第 59 回帝國議會眾議院議事速紀錄第 5 號〉，《官報》，1931 年 1 月 25 日，號外，頁 77-81。

143 二松堂編輯所，《第五十九回帝國議會議事錄眾議院》（東京：二松堂，1931 年），頁 79-83。

所據為何者，但王世慶認為這些資料可「糾合釐正公報中事實，俾安置於真相之下」；¹⁴⁴ 對照當時日本官方資料與臺人批判，此篇日本國會議員對霧社事件的質詢，堪稱提供另一種視野關照。1969年王世慶翻譯出伊能嘉矩的〈彭佳嶼調查報告書〉一文，¹⁴⁵ 則算真正完整由《臺灣總督府檔案》做大幅而完整之篇章翻譯。

而在這之前，1961年《臺灣文獻》中省文獻會動態，「整理文獻」項下卻出現「編撰日據時期臺灣外事日誌（二），約2萬5千字」，¹⁴⁶ 此處所敘之事，應即後來發表於臺灣文獻之〈日據時期臺灣外事日誌〉。¹⁴⁷ 據王世慶於文前自述，謂：「本文初以整理檔案中之外事公文為務，故國交事原擬付之闕如，頃有友人告以既有此發表之機會，何不附會有關國交大事而增廣之，而使其名符其實地成為臺灣外事日記乎！？余乃從之，急就類書，草率撮要而增益之。」

〈日據時期臺灣外事日誌〉兩篇算介於譯作與論文之間的史事年表，王世慶先生透過爬梳《臺灣總督府檔案》外事及其他相關資料，逐年逐月編列重要事件，但對於重要事項，又有做部分的摘錄或翻譯。此事未見於省政府施政報告中，是王世慶先生奉命翻譯或者自行趣味所做，不得而知；然而，此作品風格與過去省文獻會以選譯抗日檔案差異甚大，擴充了《臺灣總督府檔案》翻譯選編的應用主題內容。

二、通志

如前所述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因修志需要，而有要求「保存或借用」總督府檔案的建議，然而王世慶認為：「當時已經在修臺灣通志了，但是要利用這批檔案，要打開從頭查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所以修志期間並沒

144 王世慶譯，〈日本國會議會紀錄中的霧社事變〉，頁105。

145 王世慶譯，〈彭佳嶼調查報告書〉，《臺灣文獻》，第20卷第3期（1969年），頁118-124。

146 編纂組，〈各縣市文獻委員會動態〉《臺灣文獻》，第12卷第3期（1961年），頁173。

147 王世慶，〈日據時期臺灣外事日誌（一）〉，《臺灣文獻》，第11卷第2期（1960年），頁237-254及王世慶，〈日據時期臺灣外事日誌（二）〉，《臺灣文獻》，第12卷第2期（1961年），頁106-120。

有參考這批檔案」，¹⁴⁸ 此亦如所述 1951 年 3 月內政部即核定「臺灣省通志凡例綱目」，臺灣省通志修纂工作算是正式啟動，而總督府檔案開始移交自 1953 年開始，當時，《臺灣省通志稿》已有 5 篇送審，4 篇初步付印，6 篇完成初稿；¹⁴⁹ 要將這將已完成或半完成作品退回，重新查閱《臺灣總督府檔案》，確實有其困難。

然而翁佳音仍指出，在王世慶編纂通志中：「疆域與外事部分，也參用了不少總督府公文類纂的檔案」，¹⁵⁰ 此亦在王世慶〈參與光復後臺灣地區修志之回顧及對重修省志之管見〉一文中，有相同描述。¹⁵¹

筆者比對郭海鳴、王世慶《臺灣省通志稿政事志行政篇》¹⁵² 一書，確實有將《臺灣總督府檔案》列入參考書目。而在整修臺灣省通志時期，王世慶《臺灣省通志土地志疆域篇》，¹⁵³ 則有明確標註參採總督府檔案內容，也算戰後開志書引用《臺灣總督府檔案》之先。

後來，王世慶亦整修《臺灣省通志政事志外事篇》，來源為賴永祥、卜新賢及張美惠《臺灣省通志稿政事志外事篇》，大都仍維持賴永祥原本體例，並未擅改。

然而，比較賴永祥版與王世慶版《外事篇》，兩者內容確實有些許不同，例如以日治時期「外國人之宿泊或登錄」為例，賴版以 1899 年「外國人管理規則」為日本政府在臺最早訂定法規，¹⁵⁴ 而王則以則改為 1896 年之「外國人管理規則」為嚆矢。¹⁵⁵ 此在〈日據時期臺灣外事日誌（一）〉，亦有所

148 王世慶，〈六十年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的保管、整理、編譯、運用和研究〉，頁 540。

149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42 年 12 月》，頁 41。

150 翁佳音，〈功在臺灣文獻學術界的王世慶先生〉，頁 87。本部分亦蒙吳文星教授指正，另對王世慶修志有較深入評析，應為前註解所述許雪姬〈王世慶先生與臺灣地方志的纂修〉一文，惟該文並無正式出版。

151 王世慶，〈參與光復後臺灣地區修志之回顧及對重修省志之管見〉，《臺灣文獻》，第 35 卷第 1 期（1984 年），頁 1-18。

152 郭海鳴、王世慶，《臺灣省通志稿卷（3）政事志行政篇》（臺北：省文獻會，1957 年）。

153 王世慶，《臺灣省通志（卷 1）土地志疆域篇（1-5）》（臺北：省文獻會，1970 年）。

154 賴永祥、卜新賢、張美惠，《臺灣省通志稿（卷 3）政事志外事篇》（臺北：省文獻會，1960 年），頁 252。

155 王世慶，《臺灣省通志（卷 3）政事志外事篇（1-3）》（臺北：省文獻會，1971 年），頁 144。

記錄，惟法規名稱所譯不同，在〈日據時期臺灣外事日誌（一）〉譯為「外僑管理規則」。¹⁵⁶ 然而，如果回歸到該文所引用〈明治二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甲種永久保存第六卷〉檔案，則確實可對應到該卷中保存之「外國人取扱規則制定」，此規則裁定與公布皆在 1896 年。¹⁵⁷ 由此，亦可知翁佳音所言無誤，並顯示王世慶除將自己譯作用於通志撰寫，亦對過去通志稿有所校正。

三、期刊

1954 年劉枝萬以未署名形式於《臺灣風物》發表一篇長野義虎所著《生蕃地探檢（險）談》¹⁵⁸ 譯作，其中前言敘及：此為長野義虎演講會內容，速記本被列入於公文類纂明治 30 年乙 36 之 7，¹⁵⁹ 後來，尾崎秀真據此整理，並以〈生蕃地探險談〉發表於《臺灣山岳》；¹⁶⁰ 然而劉枝萬當時在臺北圖書館（今國立臺灣圖書館）又發現一本《生蕃地探檢談》石印本。他認為《臺灣山岳》的〈生蕃地探險談〉有較多的錯誤，因此，根據此一臺北圖書館《生蕃地探檢談》來進行翻譯。

然而如果根據現《臺灣總督府檔案》，可以發現，《臺灣總督府檔案》中版本為手寫，並有紅色朱批，〈生蕃地探險談〉一文並未全據朱批改正，《生蕃地探檢談》石印一書則改得較為完整。由此可知，劉枝萬雖知總督府公文類纂有此一份資料，但他當時似乎仍無法親睹《臺灣總督府檔案》。然而，這也是《臺灣總督府檔案》在日治時期，即有被利用而轉為期刊文章素

156 王世慶〈日據時期臺灣外事日誌（一）〉，頁 244。

157 「外國人取扱規則制定」（1896 年 08 月 08 日），〈明治二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甲種永久保存第六卷外交衛生土地家屋籍及人事軍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0061005、「外國人取扱規則」（1896 年 08 月 01 日），〈明治二十九年臺南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二十卷官房門外事部〉，《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683003。

158 長野義虎著，劉枝萬譯，〈番境探險譚〉，《臺灣風物》，第 4 卷第 6-7 期（1954 年），頁 61-86。

159 此應為〈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十六卷殖產〉第 7 件，見「長野義虎生蕃探險談」（1897 年 11 月 02 日），〈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十六卷殖產〉，《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0180007。

160 長野義虎著，劉枝萬譯，〈番境探險譚〉，頁 61-86。

材案例。¹⁶¹

戰後，《臺灣總督府檔案》成為研究者撰寫文章素材，仍是以典藏此一檔案，並負責通志編纂的省文獻會內部職員為主，1955 年時任整理組長的曾迺碩，即利用《臺灣總督府檔案》撰寫〈中華民族乙未抗日史導論—兼為「民主國」諸說正誤〉一文，在文中亦有清楚揭示，資料來自《臺灣總督府檔案》，應是首開以此部檔案作為材料來源之先。¹⁶²

曾迺碩在此文發表的前兩天，亦在《高市文物》發表兩篇文章，一篇與吳家憲共同具名的〈民前十六年打狗港的貿易〉¹⁶³，另外一篇則是以自己名義發表的〈高雄市鹽埕火災的史料〉¹⁶⁴。〈高雄市鹽埕火災的史料〉一文並未述及引用何處資料來源，然而考察該文，可以發現該篇文章所謂「資料」，也係出自《臺灣總督府檔案》中的《臺南縣公文類纂》。¹⁶⁵

省文獻會編纂莊金德，亦以筆名莊德撰寫〈余清芳革命四十年祭〉，較上述文章只晚約一個月，¹⁶⁶ 其後則陸續發表〈日據時期臺北之保甲〉、〈日據初期臺北之警治〉、〈日治前期臺北之警治〉及〈日治後期臺北之警治〉；¹⁶⁷ 雖這些文稿未說明有引自《臺灣總督府檔案》，然而，在《臺北文物》第 6 卷第 2 期編後語，卻提到：「如莊德先生的〈日治前期臺北之警治〉的材料則多出自日人的檔案」，¹⁶⁸ 由此，亦可推測，莊金德在這幾篇文章中亦使用了《臺灣總督府檔案》。

161 有關日治總督府檔案被運用於報刊、書籍的討論可參考：黃紹恆，〈臺灣總督府檔案的周邊與其運用〉，頁 161-180。

162 曾迺碩，〈中華民族乙未抗日史導論—兼為「民主國」諸說正誤〉，《臺灣文獻》，第 6 卷第 3 期（1955 年），頁 1-28。

163 曾迺碩、吳家憲，〈民前十六年打狗港的貿易〉，《高市文物》，第 1 卷第 3 期（1955 年），頁 5-14。

164 曾迺碩，〈高雄市鹽埕火災的史料〉，《高市文物》，第 1 卷第 3 期（1955 年），頁 71。

165 「官塩取締方ノ儀照會ノ件」（1895 年 12 月 01 日），〈明治二十八年至明治二十九年臺南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十五卷內務門殖産部〉，《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9678021。曾迺碩在上註文中提及，所用資料中缺了兩字，正與本檔案內容一致。

166 莊金德（莊德），〈余清芳革命四十年祭〉，《臺灣風物》，第 5 卷第 10 期（1955 年），頁 4-10。

167 莊金德，〈日據時期臺北之保甲〉，《臺北文物》，第 5 卷第 2-3 期（1957 年），頁 56-62、莊金德，〈日據初期臺北之警治〉，《臺北文物》，第 5 卷第 4 期（1957 年），頁 118-126、莊金德（莊德），〈日據前期臺北之警治〉，《臺北文物》，第 6 卷第 2 期（1957 年），頁 104-134 及莊金德（莊德），〈日據後期臺北之警治〉，《臺北文物》，第 6 卷第 3 期（1958 年），頁 41。

168 不著撰人，〈編後語〉，《臺北文物》，第 6 卷第 2 期（1957 年），頁 150。

相較於曾迺碩、莊金德，王世慶在期刊文章引用《臺灣總督府檔案》作為材料似乎起步較晚，王世慶在 1958 年 3 月與 12 月才在《臺灣文獻》各發表一篇有關清代臺灣米穀的文章，分別是〈清代臺灣的米產與外銷〉及〈清代臺灣的米價〉，¹⁶⁹〈清代臺灣的米產與外銷〉一文並未引用到《臺灣總督府檔案》，但〈清代臺灣的米價〉則引用了總督府檔案，可以說是王世慶在期刊論文中，較正式引用《臺灣總督府檔案》的開始。其後，王世慶多篇文章引用或取材自《臺灣總督府檔案》，例如前述〈日據時期臺灣外事日誌（一）〉及〈日據時期臺灣外事日誌（二）〉兩文，素材幾乎都取自《臺灣總督府檔案》；而以龍逸為筆名在《臺北文物》發表之〈乙未日本侵臺史料三則〉、¹⁷⁰〈誰請日軍入臺北城補遺〉¹⁷¹等文章，亦多以檔案素材內容作簡短鋪陳。

1968 年〈鹿港開港史〉係當時省文獻會應省議員要求所做，由王世慶執筆，主任委員張炳楠掛名發表。該篇雖談「鹿港開港」，但極大篇幅談鹿港日治貿易，主要引用鹿港當地所保留〈鹿港街役場檔案〉及〈鹿港第二公學校鄉土史研究〉，但相關的表格資料來源，亦包括《臺灣總督府檔案》。¹⁷² 1969 年王世慶發表〈清季及日據初期南部臺灣之牛墟〉一文，¹⁷³除了題材上是王世慶所謂的「臺灣庶民社會」，¹⁷⁴在取材上，則以碑記及總督府檔案交互應用，說明牛墟的制度與運作。這兩篇都是王世慶較早將《臺灣總督府檔案》用於探討社會經濟論述文章的案例。

因此，除了前述 1966 年，藉由檔案整理完成〈介紹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一文，提供其他人了解《臺灣總督府檔案》的相關內容外；王世慶在

169 王世慶，〈清代臺灣的米產與外銷〉，《臺灣文獻》，第 9 卷第 1 期（1958 年），頁 15-32 及王世慶，〈清代臺灣的米價〉，《臺灣文獻》，第 9 卷第 4 期（1958 年），頁 11-20。

170 王世慶（龍逸），〈乙未日本侵臺史料三則〉，《臺北文物》，第 9 卷第 2-3 期（1960 年），頁 60-68。

171 王世慶（龍逸），〈誰請日軍入臺北城補遺〉，《臺北文物》，第 10 卷第 1 期（1961 年），頁 53-54。

172 王世慶（張炳楠），〈鹿港開港史〉，《臺灣文獻》，第 19 卷第 1 期（1968 年），頁 1-44。

173 王世慶，〈清季及日據初期南部臺灣之牛墟〉，《臺灣文獻》，第 20 卷第 4 期（1969 年），頁 34-52。

174 可參見王世慶口述，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訪問，《王世慶訪問紀錄》，頁 208-221。

文章的書寫上，¹⁷⁵ 由短篇漸漸增長篇幅，由摘寫翻譯轉而有所論述，並跳脫過往其他人引用檔案者只是利用檔案來補充某事件，特別是抗日活動的說明，而將檔案運用於經濟、庶民生活等領域，也算是為檔案開拓出一個方向。

伍、結論

在省文獻會早期，《臺灣總督府檔案》由接收到典藏管理，再到提供論著研究，王世慶因職務關係，推測在省文獻會接收《臺灣總督府檔案》時，應較無直接關係。一般而言，公務員承長官之命，主導性有限，又需下屬合作，很難講某事功勞由某人獨攬。然而，綜合前述與表列，王世慶在典藏管理與論著研究，不同於省文獻會其他同儕，而有獨特貢獻。

首先，王世慶在 1959 年調任整理組組長後，除了必須因應時局疏散檔案外，在檔案的管理上，展開了幾項檔案整理基礎工作，例如核校檔案清冊與實體檔案，並整理出檔案目錄，並試圖對檔案加以分類。

而王世慶未擔任組長前，省文獻會以整理編譯抗日事蹟為主要檔案工作之一，然而，在王世慶任組長後，開始有了製作卡片目錄的紀錄；之後，由中美會資助的「編製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卡片目錄」，在省文獻會主要也是由王世慶與王詩琅合作進行，後來，王世慶即使卸任整理組組長職務，但仍在計畫中扮演重要角色。

而前述積極提供民眾檔案諮詢查復工作，而使得檔案應用在各不同的實際需要，雖然非自王世慶擔任組長時才開始進行，但在王世慶擔任組長任內，這項工作更在報章中公開，件數也急遽增加。

其次，在檔案的應用上，原本《臺灣總督府檔案》移轉省文獻會，即為臺灣省通志編寫所需；而相較大多數的編寫者，王世慶也確實有將《臺灣總督府檔案》應用於《臺灣省通志》纂修各階段。

175 周婉窈增訂，〈王世慶先生著作目錄〉，《臺灣風物》，第 61 卷第 2 期（2011 年），頁 124-140。

而應用《臺灣總督府檔案》作文章寫作上，早於王世慶者，有些以小篇幅短文做該則檔案內容的改寫，或者單純直接翻譯為中文；部分雖將《臺灣總督府檔案》引入論文中，但未依學術慣例引註，且多半偏於抗日或政治制度史。王世慶除了撰寫〈介紹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一文，讓外界了解《臺灣總督府檔案》，在運用檔案撰寫文章上，也不僅僅作檔案的傳譯介紹，而是積極地將《臺灣總督府檔案》做為一種研究素材，結合其他的圖書、碑記、古文書等等資料，來進行庶民生活、經濟研究，開創出總督府檔案應用的道路。

而另值得一提，1967年年王世慶參與「近現代臺灣口述歷史」計畫，訪問黃旺成，即曾以《臺灣總督府檔案》作為訪問問題的材料準備，並確實在訪談中向黃旺成提出問題。¹⁷⁶極可能也是首次有學者將《臺灣總督府檔案》做為口述歷史問題的材料準備。

洪敏麟就認為：「在文獻會日文造詣最好的就是王世慶先生，也是文獻館整理及使用檔案最有成就的一位。以前整理組的檔案很少有人利用，使用上也相當不方便，因他擔任整理組長，加上他又非常認真，在整理研究工作上有所成就。」¹⁷⁷說明王世慶除了日文能力，仍在於「非常認真」，而使得檔案研究上有相當成果。

本文考察《臺灣總督府檔案》接收、典藏、應用等面向可知，在王世慶擔任組長，管理《臺灣總督府檔案》這段時期，不論在典藏管理或者論著研究，王世慶先生以其嚴謹細膩之態度，推動卡片目錄編製、檔案諮詢回復，並實際將檔案應用於通志纂修、庶民經濟史研究……等等，確實有異於同儕，對《臺灣總督府檔案》整理推廣應用卓有貢獻。

王世慶第一次自省文獻會退休後，投入了古文書研究，之後兩度回到省文獻會，因職務關係，負責工作也與《臺灣總督府檔案》較無相關，在會中並沒有辦法再積極參與總督府檔案管理工作。

176 王世慶，〈黃旺成先生訪問記錄〉，收入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臺灣口述歷史》（板橋：林本源基金會，1991年），頁99。

177 洪敏麟口述，林金田、謝嘉梁訪問，劉澤民紀錄，《文獻人生：洪敏麟先生訪問紀錄》，頁99。

但因王世慶長期從事《臺灣總督府檔案》管理工作，許多仍須借重王世慶先生經驗，這些包括了省文獻會制定日治檔案的閱覽規則，¹⁷⁸ 以及其後由中研院與省文獻會合作展開日治檔案的數位化工作。¹⁷⁹ 因此，早期王世慶典藏管理臺灣總督府檔案之相關基礎，成為日後《臺灣總督府檔案》數位化，及今日全面性開放應用之基礎。而也因為過去王世慶在日治檔案各項的研究應用與推廣，讓學界得以了解《臺灣總督府檔案》的內容與價值，也促進了日治臺灣史研究的蓬勃發展。

178 鄧憲卿，《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志》，頁 638。

179 可參見：中央研究院日治時期檔案整理小組編，《臺灣總督府檔案數位化整理紀要》及張家榮、劉仁翔，〈臺灣總督府檔案：從歷史文獻到數位人文脈動的軌跡〉，頁 65-103。

附錄：王世慶與總督府檔案相關事項表

年份	月	王世慶職務	首長	相關事項		
1948	7	採訪員	黃純青	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決議請省府移轉日治時期檔案		
1949	2			王世慶任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採訪員		
1949	7	組員	林獻堂	省文獻會成立 王世慶任組員		
1950	3		黃純青	黃純青任省文獻會主任委員		
1951	3			內政部核准臺灣省通志凡例綱目		
1951	9			省文獻會函請省秘書處移轉《臺灣總督府檔案》		
1951	10			省秘書處函覆同意移轉《臺灣總督府檔案》		
1953	5			省文獻會與省秘書處移轉交接《臺灣總督府檔案》		
1953	12			林朝榮、王世慶《臺灣省通志稿土地志地理篇》出版		
1954	11			編纂	林熊祥	林熊祥任主任委員
1955	6					施政報告謂：「整理日據時期余清芳抗日事件資料」
1955	8					省文獻會製作「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目錄」函送省秘書處，並請省政府將未裝訂《臺灣總督府檔案》移轉省文獻會
1955	9	曾迺碩發表〈高雄市鹽埕火災的史料〉				
1956	10	未裝訂《臺灣總督府檔案》完成移轉				
約 1956-1958		《臺灣總督府檔案》移至長安東路書庫保存				
1957	6	郭海鳴、王世慶《臺灣省通志稿政事志行政篇》出版				
1958	12	王世慶發表〈清代臺灣的米價〉				
1959	1	整理組組長	王世慶任省文獻會整理組組長			

1959	10	整理組組長	林熊祥	施政報告謂：「編製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卡片目錄 800 件」
1960	6		李騰嶽	李騰嶽任主任委員
1960	6			王世慶發表〈日據時期臺灣外事日誌（一）〉
1961	6			王世慶發表〈日據時期臺灣外事日誌（二）〉
1963				省文獻會進行臺灣省通志稿增修
1963	3		方家慧	方家慧任主任委員
1963	4			王世慶於文獻研究會主講〈文獻資料的整理和保存〉
1963	5			《臺灣總督府檔案》疏遷至中和
約 1963-1964				開放《臺灣總督府檔案》供民眾閱覽
1964	7		洪樵榕	洪樵榕任主任委員
1965	10			省文獻會出版《羅福星抗日革命案全檔》
1966	1			王世慶《增修臺灣省通志稿土地志地理篇》（含地名沿革）出版
1966	2			臺灣研究研討會參觀《臺灣總督府檔案》
1966	5		張炳楠	張炳楠任主任委員
1966	12			王世慶在《臺灣文獻》季刊發表〈介紹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
1968	3			張炳楠（王世慶）發表〈鹿港開港史〉
1968	4			正式開始執行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委員會「編製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卡片目錄計畫」
1968				省文獻會開始進行《臺灣省通志稿》整修計畫
1969	3	任省文獻會編纂		
1969	12	編纂	「編製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卡片目錄計畫」正式宣告結束	

王世慶對《臺灣總督府檔案》的介紹、管理與研究

1969	12	編纂	張炳楠	王世慶發表〈清季及日據初期南部臺灣之牛墟〉
1970	6			王世慶《整修臺灣省通志土地志疆域篇》出版
1971	6			王世慶《臺灣省通志人民志宗教篇》、《臺灣省通志政事志外事篇》出版
1972	11	第一次退休		王世慶第一次退休

資料來源：1.《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檔案》。2.《臺灣省級機關檔案》。3.王世慶口述，周婉窈撰述，《臺灣史開拓者王世慶的人生之路》。4.王世慶口述，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訪問，《王世慶訪問紀錄》。5.方家慧，《浮生紀實》。6.方豪，〈參觀臺灣總督府檔案的動機和感想〉。7.李榮聰，〈編後記：從臺灣省通志館採訪員談起〉。8.張家榮、劉仁翔，〈臺灣總督府檔案：從歷史文獻到數位人文脈動的軌跡〉。9.盛清沂，〈臺灣省通志纂修始末〉。10.曾迺碩，〈高雄市鹽埕火災的史料〉。11.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48年10月》。12.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50年11月》。13.鄧憲卿，《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志》。

參考書目

壹、檔案文獻

- 《王世慶人事資料》，臺灣文獻館。
-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檔案管理局。
- 《國防部最高軍事法院檢察署檔案》，檔案管理局。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檔案》，臺灣文獻館。
-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臺灣文獻館。
- 《臺灣省級機關檔案》，臺灣文獻館（原件：檔案管理局）。
- 《臺灣省政府委員會議》，臺灣文獻館（原件：檔案管理局）。
- 《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文獻館。
- 《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臺灣文獻館。

貳、報刊、公報

- 《中央日報》，1966 年 6 月。
- 《中國時報》，1995 年 9 月。
- 《自立晚報》，1959 年 3 月至 1962 年 3 月。
- 《官報》，東京，1931 年 1 月。
- 《監察院公報》，1996 年 5 月。
- 《臺灣民聲日報》，1963 年 4 月。
- 《臺灣省政府公報》，1948 年 3 月至 1954 年 12 月。

參、專書

- 二松堂編輯所，《第五十九回帝國議會議事錄眾議院》。東京：二松堂，1931 年。

方家慧，《浮生紀實》。出版項不詳。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臺北：學生書局，1969年。

王世慶，《臺灣省通志（卷1）土地志疆域篇（1-5）》。臺北：省文獻會，1970年。

王世慶，《臺灣省通志（卷3）政事志外事篇（1-3）》。臺北：省文獻會，1971年。

王世慶口述，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訪問，《王世慶訪問紀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3年。

王世慶口述，周婉窈撰述，《臺灣史開拓者王世慶的人生之路》。板橋：新北市文化局，2011年。

中央研究院日治時期檔案整理小組編，《臺灣總督府檔案數位化整理紀要》。臺北：中研院，2002年。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臺灣社會經濟史國際研討會：慶祝王世慶先生七五華誕》。臺北：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未出版。

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林本源中華文教基金會九十一年度年會暨王世慶與臺灣社會經濟史研討會》。臺北：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未出版。

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林本源基金會，《臺灣研究在德國、紀念王世慶先生研討會暨2011年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年會會議資料》。臺北：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未出版。

洪敏麟口述，林金田、謝嘉梁訪問，劉澤民紀錄，《文獻人生：洪敏麟先生訪問紀錄》。南投：臺灣文獻館，2010年。

徐國章，《臺灣總督府檔案學習入門》。南投：臺灣文獻館，2017年。

張俊仁，《臺灣抗日忠烈錄（第一輯）》。臺北：省文獻會，1965年。

莊金德、賀嗣章編譯，《羅福星抗日革命案全檔》。臺北：省文獻會，1965年。

許倬雲，《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年。

郭海鳴、王世慶，《臺灣省通志稿卷(3)政事志行政篇》。臺北：省文獻會，1957年。

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臺灣口述歷史》。板橋：林本源基金會，1991年。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臺灣研究研討會紀錄》。臺北：臺灣大學人類學系，1968年。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42年12月》。臺北：省政府，1953年。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44年6月》。臺北：省政府，1955年。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44年12月》。臺北：省政府，1955年。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45年6月》。臺北：省政府，1956年。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47年6月》。南投：省政府，1958年。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48年10月》。南投：省政府，1959年。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49年5月》。南投：省政府，1960年。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50年11月》。南投：省政府，1961年。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53年5月》。南投：省政府，1964年。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54年6月》。南投：省政府，1965年。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55年6月》。南投：省政府，1966年。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63年3月》。南投：省政府，1974年。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64年3月》。南投：省政府，1975年。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64年9月》。南投：省政府，1975年。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施政報告，65年3月》。南投：省政府，1976年。

- 蔡榮根，《在監獄裡出生的名醫》。三重：李蒼降教育基金會，2023年。
- 鄧憲卿，《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志》。南投：省文獻會，1998年。
- 蕭富隆、蔡麗卿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特藏日據時期檔案簡介》。南投：省文獻會，1999年。
- 賴永祥、卜新賢、張美惠，《臺灣省通志稿（卷3）政事志外事篇》。臺北：省文獻會，1960年。
- 賴永祥口述，許雪姬、張隆志、陳翠蓮訪談，《坐擁書城：賴永祥先生訪問紀錄》（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7）。
- 檜山幸夫等，《臺灣總督府檔案之認識與利用入門》。南投：臺灣文獻館，2002年。
-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續曲》。中和：印刻文學出版社，2016年。

肆、專書、期刊或學位論文

- 不著撰人，〈本館館訊七、館務動態〉，《臺灣省通志館館刊》，創刊號（1948年），頁53。
- 不著撰人，〈編後語〉，《臺北文物》，第6卷第2期（1957年），頁150。
- 不著撰人，〈二年來本省文獻問題之解答彙報〉，《臺灣文獻》，第12卷第2期（1961年），頁127-140。
- 不著撰人，〈訪問藍厚理先生〉，《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2期（1987年），頁16-18。
- 毛一波，〈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業績〉，收入毛一波，《古今臺灣文獻考》。（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77年），頁162-172。
- 中村孝志原著，王世慶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臺灣番社戶口表〉，《臺灣文獻》，第6卷第4期（1955年），頁67-68。

- 王世慶，〈介紹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文獻》，第 17 卷第 4 期（1966 年），頁 157-192。
- 王世慶，〈六十年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的保管、整理、編譯、運用和研究〉，《臺灣文獻》，第 60 卷第 1 期（1993 年），頁 537-552。
- 王世慶，〈文獻資料的整理和保存〉，《臺灣文獻》，第 14 卷第 4 期（1963 年），頁 233-238。
- 王世慶，〈日據時期臺灣外事日誌（一）〉，《臺灣文獻》，第 11 卷第 2 期（1960 年），頁 237-254。
- 王世慶，〈日據時期臺灣外事日誌（二）〉，《臺灣文獻》，第 12 卷第 2 期（1961 年），頁 106-120。
- 王世慶，〈參與光復後臺灣地區修志之回顧及對重修省志之管見〉，《臺灣文獻》，第 35 卷第 1 期（1984 年），頁 1-18。
- 王世慶，〈清代臺灣的米產與外銷〉，《臺灣文獻》，第 9 卷第 1 期（1958 年），頁 15-32。
- 王世慶，〈清代臺灣的米價〉，《臺灣文獻》，第 9 卷第 4 期（1958 年），頁 11-20。
- 王世慶，〈清季及日據初期南部臺灣之牛墟〉，《臺灣文獻》，第 20 卷第 4 期（1969 年），頁 34-52。
- 王世慶，〈黃旺成先生訪問記錄〉，收入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臺灣口述歷史》。（臺北：林本源基金會，1991 年），頁 71-114。
- 王世慶，〈臺灣史料的調查與介紹〉，《臺灣風物》，第 25 卷第 4 期（1974 年），頁 3-23。
- 王世慶，〈蘭嶼歷史地理雜識〉，《臺灣文獻》，第 9 卷第 2 期（1958 年），頁 40-41。

- 王世慶（張炳楠），〈鹿港開港史〉，《臺灣文獻》，第 19 卷第 1 期（1968 年），頁 1-44。
- 王世慶（龍逸），〈乙未日本侵臺史料三則〉，《臺北文物》，第 9 卷第 2-3 期（1960 年），頁 60-68。
- 王世慶（龍逸），〈誰請日軍入臺北城補遺〉，《臺北文物》，第 10 卷第 1 期（1961 年），頁 53-54。
- 王世慶譯，〈日本國會議會紀錄中的霧社事變〉，《臺灣文獻》，第 6 卷第 3 期（1955 年），頁 105-130。
- 王世慶譯，〈彭佳嶼調查報告書〉，《臺灣文獻》，第 20 卷第 3 期（1969 年），頁 118-124。
- 本刊同人，〈本刊創刊二週年概況〉，《臺灣風物》，第 3 卷第 5、6 期（1954 年），頁 4-6。
- 本社編輯部，〈歷年臺灣各大學研究所有關臺灣文史研究博碩士論文目錄〉，《臺灣風物》，第 32 卷第 1 期（1982），頁 102-105。
- 李季樺，〈典型在夙昔：王世慶先生與古文書、族譜的蒐集與研究〉，《臺灣風物》，第 61 卷第 4 期（2011 年），頁 151-168。
- 李榮聰，〈編後記：從臺灣省通志館採訪員談起〉，《臺灣文獻》，第 62 卷（2011 年），頁 39-54。
- 呂實強、李孝悌、孫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及臺中市收藏有關臺灣史料初步調查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2 期（1983 年），頁 495-499。
- 周婉窈增訂，〈王世慶先生著作目錄〉，《臺灣風物》，第 61 卷第 2 期（2011 年），頁 124-140。
- 東山京子，〈門類別分類から見た臺灣総督府文書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第 39 卷第 2 期（2019 年），頁 1-73。

林熊祥，〈本省十年來的文獻工作〉，《臺灣文獻》，第 9 卷第 1 期（1958 年），頁 51-64。

林聰標、劉石吉執筆，〈迎許倬雲教授到新亞書院講學〉，收入許倬雲，《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45-50。

邱欣怡，〈臺灣省通志館之成立經過與組織編制初探〉，《臺灣文獻》，第 60 卷第 3 期（2009 年），頁 201-220。

金關丈夫原著，王世慶譯，〈諸蕃志之談馬顏國〉，《方志通訊》，第 3 卷第 3-4 期（1954 年），頁 16-19。

長野義虎著，劉枝萬譯，〈番境探險譚〉，《臺灣風物》，第 4 卷第 6-7 期（1954 年），頁 61-86。

張谷源，〈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分類板簡介〉，《臺灣文獻別冊》，第 4 期（2003 年），頁 2-7。

翁佳音，〈功在臺灣文獻學術界的王世慶先生〉，《史聯雜誌》，第 8 期（1986 年），頁 86-97。

張俊仁，〈臺灣省縣市文獻工作會報紀錄〉，《臺灣文獻》，第 17 卷第 3 期（1966 年），頁 193-195。

張家榮，〈文獻「名人」賀嗣章〉，《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第 209 期（2021 年）。

張家榮、劉仁翔，〈臺灣總督府檔案：從歷史文獻到數位人文脈動的軌跡〉，《第 11 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臺灣文獻館，2021 年），頁 65-103。

淺井惠倫原著，王世慶譯，〈臺灣高砂族語言的分類〉，《臺灣文獻》，第 6 卷第 4 期（1955 年），頁 57-58。

盛清沂，〈臺灣省通志纂修始末〉，《臺灣風物》，第 26 卷第 3 期（1976 年），

頁 294-324。

莊松林（朱鋒），〈導引日軍無事進入臺南城的陳修五的履歷書〉，《臺灣風物》，第 22 卷第 4 期（1969 年），頁 43-44。

莊松林（朱鋒）譯，〈日據初期踏查龜山島兩篇記錄〉，《臺灣風物》，第 20 卷第 1 期（1969 年），頁 46-53

莊金德，〈日據時期臺北之保甲〉，《臺北文物》，第 5 卷第 2-3 期（1957 年），頁 56-62。

莊金德，〈日據初期臺北之警治〉，《臺北文物》，第 5 卷第 4 期（1957 年），頁 118-126。

莊金德（莊德），〈余清芳革命四十年祭〉，《臺灣風物》，第 5 卷第 10 期（1955 年），頁 4-10。

莊金德（莊德），〈日據前期臺北之警治〉，《臺北文物》，第 6 卷第 2 期（1957 年），頁 104-134。

莊金德（莊德），〈日據後期臺北之警治〉，《臺北文物》，第 6 卷第 3 期（1958 年），頁 1-41。

莊樹華，〈臺灣總督府檔案的編排與描述〉，《檔案季刊》，第 7 卷第 3 期（2008 年），頁 54-72。

許雪姬，〈忘年之交 - 獻堂仙與雲萍師〉，《臺灣文獻》，第 57 卷第 1 期（2006 年），頁 126-131。

陳文添，〈臺灣省文献委員会收藏之日治時期檔案——兼述拓殖大学相關學校文書目錄——〉，《拓殖大学百年史》，3 號（1999 年），頁 29-40。

陳文添，〈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收藏之檔案及提供利用概況〉，《臺灣學研究》，第 4 期（2007 年），頁 77-90。

- 陳漢光，〈臺灣地方志展覽〉，《文獻專刊》，第 3 卷第 2 期（1952 年），頁 75-77。
- 陳漢光，〈雅美族的金銀文化〉，《文獻專刊》，第 5 卷第 1、2 期（1954 年），頁 13-22。
- 曾迺碩、吳家憲，〈民前十六年打狗港的貿易〉，《高市文物》，第 1 卷第 3 期（1955 年），頁 5-14。
- 曾迺碩，〈高雄市鹽埕火災的史料〉，《高市文物》，第 1 卷第 3 期（1955 年），頁 71。
- 曾迺碩，〈中華民族乙未抗日史導論——兼為「民主國」諸說正誤〉，《臺灣文獻》，第 6 卷第 3 期（1955 年），頁 1-28。
- 栗原純，〈臺灣總督府檔案與臺灣史研究〉，《成大歷史學報》，第 37 號（2009 年），頁 1-20。
- 黃淑惠，〈臺灣總督府檔案編排與描述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圖檔所碩士論文，2007 年）。
- 黃紹恆，〈臺灣總督府檔案的周邊與其運用〉，檜山幸夫等，《臺灣總督府檔案之認識與利用入門》。（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 年），頁 155-181。
- 曾郁明，〈巨變與衝擊：論社會主義思潮對臺灣左翼運動的影響（以 1920~1937 年論述）〉，臺北：師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 楊翠華，〈王世杰與中美科學學術交流，1963-1978：援助或合作？〉，《歐美研究》，第 29 卷第 2 期（1999 年），頁 41-103。
- 廖漢臣，〈臺灣史料的蒐集〉，收入毛一波，《修志方法論集》。（臺北：方志研究會，1954 年），頁 101-102。
- 褚填正，〈王世慶與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研究及發展〉，《臺灣文獻》，第 63 卷第 4 期（2012 年），頁 165-207。

劉育嘉，〈王世慶在臺灣史研究上貢獻之析論〉，《中興大學歷史系 2014 年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論文集》。臺中：興大歷史，2014 年，頁 1-20。

編纂組，〈各縣市文獻委員會動態〉，《臺灣文獻》，第 12 卷第 3 期（1961 年），頁 173-178。

編纂組，〈省議會民政小組巡視本會〉，《臺灣文獻》，第 12 卷第 4 期（1961 年），頁 177-180。

鄭喜夫，〈莊松林年譜〉，《臺灣風物》，第 25 卷第 2 期（1974 年），頁 5-33。

賴永祥，〈臺灣文獻舉要〉，《臺灣文獻》，第 9 卷第 2 期（1958 年），頁 1-12。

總務組，〈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第二十一一次委員會議〉，《臺灣文獻》，第 14 卷第 1 期（1963），頁 186-189。

鍾淑敏，〈臺灣總督府相關檔案與日治時期臺灣史研究〉（未刊稿）。

伍、網路

「國家文化記憶庫」網站：memory.culture.tw。

「政治大學活動報名」網站：<https://moltke.nccu.edu.tw/Registration>。

Wang Shih-ching and the introduction,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of the Taiwan Sotokufu Archives

Chang Chia-jung *

Abstract

Wang Shih-ching has served in the Provincial Documents Committee of Taiwan for more than 30 years, and has been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the Archives of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Taiwan Sotokufu) for a long time. Through the contents of the archives and related records, in addition to briefly describing 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Commission of Taiwan Province Provincial Documents Committee of Taiwan and the archives reception process of the Archives of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Taiwan Sotokufu), this study considers collection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From these investigations, it is found that Wang Shih-ching has indeed demonstrated a different approach from his peers in terms of management,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and has made meaningful contributions.

Keywords : Wang Shih-ching, Archives of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Taiwan Sotokufu), Historical Research Commission of Taiwan Province, Archives Management, Public Access to Records

* Senior Specialist, Taiwan Historica.